

## 近代上海報館對新聞照片的 採集與刊印

高郁雅

### 摘 要

攝影術傳入近代中國的過程中，因照片有印證新聞、增加讀者興趣、調劑篇幅等功能，新聞界逐漸接受與應用這項技術。學界對新聞攝影的研究，過去多關注畫報雜誌上的時尚照片，或黨政報刊裡的宣傳照片；本文則關懷近代中國一般民眾接受新聞的大宗——民營商業報紙，其對照片素材的日常使用情況。

本文以上海為中心探討，因該地新聞事業領先全國，中國銷量前兩大的日報《新聞報》（1893-1949）、《申報》（1872-1949），及在新聞攝影上諸多創舉的《時報》（1904-1939）都是上海的報紙。過往研究較單從照片本身去談新聞攝影，本文則放到報館整體營運環境中思考，利用報紙文本、報人憶述及報社檔案等資料，除縱向呈現各時段的發展，亦橫向比較各報的特色：試圖探究下列問題：新聞照片何時出現在上海報紙裡？新聞照片有哪些類別？報館如何蒐集與傳遞新聞照片？照相製版的成本與印刷效果？照片多寡與各報銷量的關係？

關鍵詞：新聞攝影、新聞照片、戈公振、照相製版、影寫版



# The Collection and Publication of News Photos by Newspapers in Early Modern Shanghai

Yu-ya Kao<sup>\*</sup>

## Abstract

As photography was introduced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s photo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credibility of news stories, stimulating public interest in current events, and retaining readers' attention. The press therefore gradually accepted and made use of this new technology. Previous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mainly pay attention to fashion photography in iconic magazines or propaganda pictures in the party press. This study, however, aims at the use of photograph materials by private commercial newspapers, which were read the most by general Chinese public.

The article focuses on journalism in Shanghai, which was the leader of this new profession in the country. The city's *The Sin Wan Pao* (1893-1949) and *The Shun Pao* (1872-1949), for examples, were the top-selling newspapers in China, and another, *The Eastern Times* (1904-1939), had done pioneering works in news photography. In past studies the researchers often used photographs to discuss photojournalism. This paper widens the scope of investigation by examining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newspapers and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newspapers, using archived newspapers, memoirs of journalists, and newspaper office records as sources. In doing so,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explored: When did news photos appear in Shanghai's newspapers? What are the categories of news photos? How did newspaper offices collect and transmit

---

<sup>\*</sup>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ews photos? What were the costs of photoengraving and the resulting print quality? What wer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umber of photos used and the sale of papers?

**Keywords: Press Photography, News Photo, Ge Gongzhen, Photoengraving, Photogravure**

# 近代上海報館對新聞照片的 採集與刊印\*

高郁雅\*\*

## 壹、前言

新聞照片有提高新聞價值、增加讀者興趣、調劑篇幅等功能，為當今媒體不能或缺的內容。而攝影傳入近代中國的過程裡，新聞報館是如何應用這項技術的？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常使用報刊史料，我們知道報刊文字是記者採訪而來，但報刊上的照片呢？是如何生成的？這些問題值得仔細探究。

最初的新聞攝影研究含在攝影史裡，著名攝影家郎靜山1963年發表〈中國攝影史略〉及〈中國攝影史〉，<sup>1</sup> 介紹攝影術傳進中國時的見聞，及中國幾個攝影團體，因郎靜山曾任上海《時報》攝影記者，故憶述該報對攝影的重視。1980年代大陸學界開始出版中國攝影史的專著，如伍素心1984年的《中國攝影史話》、吳群1986年的《中國攝影發展歷程》、馬運增等1987年的《中國攝影史（1840-

---

\*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寶貴意見，特此感謝。另外本文曾於2022年11月5日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第18屆文化交流史：閱讀、書寫與訊息傳遞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感謝評論人張世瑛教授提供寶貴意見。

收稿日期：2023年3月2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6月3日。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sup>1</sup> 郎靜山，〈中國攝影史略〉，《中國攝影》，1963年，收錄於「郎靜山藝術文化發展學會」：<http://www.longchinsan.com/?p=2919>（2023年6月12日點閱）；〈中國攝影史〉，收錄於「郎靜山藝術文化發展學會」：<http://www.longchinsan.com/?cat=84&paged=2>（2023年6月12日點閱）。

1937)》、上海攝影家協會等1992年的《上海攝影史》，<sup>2</sup> 這些書整體介紹攝影在中國的發展，新聞攝影是其中的一兩章，沒有深入析論。

二十一世紀初單獨研究新聞攝影的論著出現，如謝太平2006年的〈新聞攝影在中國：從攝影傳入到人民新聞事業形成的發展歷程探析（1840-1945）〉、甘險峰2008年的《中國新聞攝影史》等，<sup>3</sup> 這些研究分期介紹攝影傳入中國報刊的歷程，以中共的新聞攝影活動為主軸，民營報刊談論較簡。還有對新聞攝影某一議題的探究，如劉欣2018年的〈新聞攝影如何變成常規：近代中國新聞界對攝影術的接受與應用〉，探討攝影術如何成長為新聞攝影，梳理新聞攝影在不同時期的形象變化；路鵬程2020年的〈從照相館到新聞館：中國近代職業攝影記者的形成與發展〉，分析新聞照片拍攝者的變化，釐清攝影記者的知識養成與職業意識，<sup>4</sup> 啟發筆者對新聞攝影的研究興趣。

本文在這些研究上追問：近代中國一般民眾閱讀的民營報紙，如何採集與刊印新聞照片？將以上海為例，因該地新聞事業領先全國，中國銷量前兩大的日報《新聞報》（1893-1949）、《申報》（1872-1949）、及在新聞攝影上諸多創舉的《時報》（1904-1939），<sup>5</sup> 都是上海的報紙。以往研究較從照片去談新聞攝影（常用清楚的原始照片，沒考慮照片在報紙上印出來的樣子），本文則放到報館整體營運去思考：新聞照片出現在上海報紙的過程？新聞照片有何類別、特色與變化？報館如何蒐集與傳遞新聞照片？照相製版的成本與印刷效果？照片多寡與

<sup>2</sup> 伍素心編著，《中國攝影史話》（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84年）；吳群，《中國攝影發展歷程》（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年）；馬運增、陳申、胡志川、錢章表、彭永祥編著，《中國攝影史（1840-1937）》（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1987年）；上海攝影家協會、上海大學文學院編，《上海攝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

<sup>3</sup> 謝太平，〈新聞攝影在中國：從攝影傳入到人民新聞事業形成的發展歷程探析（1840-1945）〉（蘭州：蘭州大學新聞學碩士論文，2006年）；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年）。

<sup>4</sup> 劉欣，〈新聞攝影如何變成常規：近代中國新聞界對攝影術的接受與應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碩士論文，2018年）；路鵬程，〈從照相館到新聞館：中國近代職業攝影記者的形成與發展〉，《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10期（2020年10月），頁110-125。

<sup>5</sup> 三報歷史可參考高郁雅，《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輔大書坊，2015年）；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邵翼之，〈我所知道的上海時報〉，《報學》，第8期（1955年12月），頁42-44。

銷量的關係？等問題。利用報紙文本、報人憶述及報社檔案等資料，縱向呈現各時段的發展，亦橫向比較各報特色，試圖呈現新聞照片在當時的意義。

## 貳、攝影傳入上海報界

世界上現存最早的照片，是法國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1826年拍攝的，以瀝青塗在白鐵版上，需曝光8小時，稱為「日光蝕刻法」。尼埃普斯過世後，合伙人達蓋爾（Louis Daguerre）繼續研究，1839年發明「銀版法」，用水銀蒸氣對曝光的銀鹽塗面進行顯影，曝光時間縮為30分鐘。1841年英國塔爾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發明「卡羅法」，將高強度的紙浸於氯化鈉、硝酸銀溶液，在紙上形成可感光的氯化銀，曝光得到負片再轉曝成正片。1851年英國阿切爾（Fredrick Scott Archer）發明「濕版法」，以碘化物溶於火棉膠後塗於玻璃片上，浸入硝酸銀溶液形成碘化銀感光層，趁濕拍照沖洗。<sup>6</sup> 濕版法兼具銀版法的清晰與卡羅法的便於複製，到被溴化銀乾片取代前流行很久。

攝影術清末傳入中國，最先在外交場合出現，如1844年法國外交使團中的攝影師埃及爾（Jules Alphonse Eugène Itier），以銀版法拍下一批照片，如兩廣總督耆英半身像。中國第一家商業照相館，是1845年美國人韋斯特（George R. West）在香港開辦的；而上海的首家照相館，由法國人李閣郎（Louis Legrand）1859年開設。<sup>7</sup> 照相館為推廣攝影及與同業競爭，會在報上登廣告，如上海《申報》1872年創刊後，即有三興、宜昌、蘇三興等照相館的廣告，都強調「西人傳授」，「勿惜工本」，「照相十分清楚」，「日後亦不褪色」，「價錢格外公道」。<sup>8</sup>

<sup>6</sup> 林澤蒼，《攝影須知》（上海：新科學書店，1955年），頁14-15、17。

<sup>7</sup> 泰瑞·貝內特著，徐婷婷譯，《中國攝影史（1842-1860）》（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頁9；仝冰雪，《中國照相館史（1859-1956）》（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88。

<sup>8</sup> 〈照相〉，《申報》，上海，1872年5月2日，第七頁；〈宜昌照相〉，《申報》，上海，1872年10月11日，第五頁；〈照相〉，《申報》，上海，1872年12月31日，第六頁。

照片雖日漸普及，但因印刷技術尚未突破，還不能登在報刊上。當時報刊偶請照相館拍攝新聞照片，然後在報上廣告，想要的人再去報社購買。《申報》有個例子，吳淞鐵路是中國第一條鐵路，1876年先修成上海至江灣段，6月30日落成開駛。日成照相館在《申報》刊登廣告，表示「蒙申報館主託照」，為了畫面「熱鬧」起見，徵求拍攝火車時的背景群眾，希望「紳商士庶」前來「俾同照入」。拍照日期7月16日，因捕捉移動火車不易，故在「火車停頓處」拍攝，考量第一班火車七點開出，拍攝時間是早上五點。照片拍好後，《申報》8月18日登出〈火輪車圖出售〉的「本館告白」，賺起這張照片的生意：

火輪車鐵路……中國之創舉，而為別埠所從未見者。本館因特請照相者拍成一圖，俾婦女童孩以及遠處人未經見有火車者，共得傳觀，一如身親其境。……每張洋銀一角正。<sup>9</sup>

對當時民眾而言，照片尚非接受新聞的常規途徑，機會偶發，經報館的販售或贈送，提供實體照片。1879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訪問上海，《申報》為使讀者「瞻仰風采」，5月24日將格蘭特照片「印成萬紙」隨報贈送。<sup>10</sup> 1897年3月10日浙江士人孫寶瑄在日記留下行程：「詣《蘇報》館，購得李傅相馬關受傷後映像二紙」，<sup>11</sup> 指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談判馬關條約、3月24日被日本右翼青年小山豐太郎拔槍射中左眼下方的事件，而孫寶瑄到上海《蘇報》購買照片，距李鴻章受傷已近兩年。

照片突破印刷技術前，為將新聞照片推廣給更多讀者，曾出現過一種「照相貼冊」的出版品。將原版照片直接裱貼成冊，輔以文字說明，觀賞效果比印刷品好，發行量也可隨機應變。有官方攝製的照片冊，作為官員奏折的參考附件，如1905年大臣桂春進呈的《倉場驗米圖》，內貼8張照片，系統呈現南糧北調、徵

<sup>9</sup> 〈鐵路落成〉，《申報》，上海，1876年6月30日，第二頁；〈火車開行〉，《申報》，上海，1876年7月1日，第三頁；〈拍照火輪車〉，《申報》，上海，1876年7月15日，第五頁；〈火輪車路告白〉，《申報》，上海，1876年7月15日，第八頁；〈火輪車圖出售〉，《申報》，上海，1876年8月18日，第一頁。

<sup>10</sup> 〈總統小像分贈〉，《申報》，上海，1879年5月24日，第一頁。

<sup>11</sup>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88。



收大米入庫的過程。也有照相館販售的，如北京瑞華照相館出版的《清西太后喪事錄》，內貼26張照片，記錄1908年慈禧出殯的各種儀式。<sup>12</sup>

待照相製版術（本文第肆章會詳述）發明後，照片開始進入報刊。中國的雜誌比報紙先使用這項技術，華文雜誌最早的是上海《萬國公報》月刊，1901年8月登出〈醇親王奉使過上海圖〉，光緒皇帝之弟醇親王載灃出使德國，途經上海時，7月16日在大馬路（南京路）被「西人之喜於攝影者」拍下照片。<sup>13</sup>

中國報紙何時刊登新聞照片？目前攝影史書以1906年南昌教案為首例。2月22日法國天主教南昌主教與南昌知縣江兆棠因傳教特權發生爭執，江兆棠喉部受傷最後不治。上海各報連日報導，<sup>14</sup> 因有被殺、自殺、被逼自刎、自刎後再被捅兩刀等說法，<sup>15</sup> 中方報紙認為被殺，《時報》、《新聞報》（圖1）3月17日刊出江兆棠喉部的特寫，詳述刀傷的寬度與長度，呼籲「吾人見此像者，當驚而醒，不當懼而怯」。<sup>16</sup>《時報》陸續刊登多張南昌教案的照片，3月18日登被民眾打死的法國教士王安之（Jean Marie Lacruche）照片，5月25日登江兆棠臨終筆



圖1、南昌知縣江兆棠被刺後之像

資料來源：〈江西南昌知縣江大令兆棠受刃傷之像〉，《新聞報》，上海，1906年3月17日，版2。

<sup>12</sup> 馬運增、陳申、胡志川、錢章表、彭永祥等編，《中國攝影史（1840-1937）》，頁81-84。

<sup>13</sup> 醇親王途經上海當天是農曆「六月朔日」，為國曆7月16日。〈醇親王奉使過上海圖〉，《萬國公報》，上海，第151冊，1901年8月，頁4。

<sup>14</sup> 〈本館接到南昌縣江令被害專電〉，《申報》，上海，1906年2月24日，版2；〈法教士刺傷南昌江令案初紀〉、〈南昌大教案〉，《時報》，上海，1906年2月27日，第二張版1。

<sup>15</sup> 楊雄威，《杯酒之間：清末南昌教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179-228。

<sup>16</sup> 〈南昌知縣江兆棠被刺後之像〉，《時報》，上海，1906年3月17日，第二張版1；〈江西南昌知縣江大令兆棠受刃傷之像〉，《新聞報》，上海，1906年3月17日，版2。

據的照片。<sup>17</sup> 這些照片來自官方，《新聞報》說明江兆棠驗屍時「用攝影器將傷處照印成圖，以資研究」；筆者則是據外務部電飭安徽當局，「用照相机照出若干張」，「以便照據向法使交涉」。<sup>18</sup> 連沒登照片的《申報》也從「江督署接到南昌寄來」的管道看到，只是沒去照相製版，而用文字描述：「觀其狀仰首閉目張口，其頸向上，在影片中創口極巨」。<sup>19</sup>

不過筆者翻閱《時報》，最早一張新聞照片不是南昌教案，而是同年（1906）稍早、2月26日一張人物大頭照〈新授順天府尹袁公樹勳之像〉，<sup>20</sup> 《時報》以照片方式報導這位新任官員，是中國報紙的第一張照片。但驚悚的南昌教案照片引起更大迴響，3月24日報導「鄂督欲觀此項照片，業已電請贛撫茲寄廿份」，4月7、10日報導「法公使日昨照會外務部，請禁各報館登載江大令之遺像」，「以顧全邦交，而維持大局」。<sup>21</sup>

《申報》首次使用新聞照片是在隔年（1907）徐錫麟安慶起事。7月6日安徽巡撫恩銘參加巡警學堂畢業典禮，遭學堂會辦徐錫麟槍殺，徐錫麟是革命組織光復會黨員，7日被凌遲處死。上海各報立刻投入報導，<sup>22</sup> 《申報》17日登出徐錫麟照片，<sup>23</sup> 20日刊登三照（圖2）：〈徐錫麟臨刑時之照相〉，註明「身穿官紗背心手上鎖銬」，後來革命史書據此記載徐錫麟笑著服刑；〈光復子陳伯平在軍械所被擊斃後之照相〉，口眼未閉死狀淒慘；〈宗漢子馬子畦被拘後之照相〉，眼神疑懼凝視拍攝者；新聞內載「徐、馬均有親筆供詞，已并其逆像一同拍照」。<sup>24</sup> 同

<sup>17</sup> 〈南昌教案禍首法教士王安之像〉、〈南昌令江兆棠之筆據〉，《時報》，上海，1906年3月18日、5月25日，第二張版1。

<sup>18</sup> 〈南昌鉅案近聞〉，《新聞報》，上海，1906年3月17日，版2。

<sup>19</sup> 〈紀南昌江令影片文字〉，《申報》，上海，1906年4月24日，版3。

<sup>20</sup> 〈新授順天府尹袁公樹勳之像〉，《時報》，上海，1906年2月26日，第二張版2。

<sup>21</sup> 〈南昌大教案二十三誌〉，《時報》，上海，1906年3月24日，第二張版2；〈南昌大教案三十六誌〉，《時報》，上海，1906年4月7日，第二張版2；〈南昌大教案三十八誌〉，《時報》，上海，1906年4月10日，第二張版2。

<sup>22</sup> 〈電一〉，《申報》，上海，1907年7月7日，版3，此日專電誤寫為「陳錫麟」；〈皖撫傷重薨逝〉，《新聞報》，上海，1907年7月8日，版3。

<sup>23</sup> 〈徐錫麟〉，《申報》，上海，1907年7月17日，版4。

<sup>24</sup> 〈徐錫麟臨刑時之照相〉、〈光復子陳伯平在軍械所被擊斃後之照相〉、〈宗漢子馬子畦被拘後之照相〉，《申報》，上海，1907年7月20日，版3、4。

天《時報》也刊登一樣照片，<sup>25</sup> 可知照片來自官方，目的是為恫嚇民眾。<sup>26</sup> 《申報》、《時報》、《新聞報》陸續刊登徐錫麟案的其他照片，如秋瑾等人。<sup>27</sup>



圖2、徐錫麟案三嫌照片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徐錫麟臨刑時之照相〉、〈光復子陳伯平在軍械所被擊斃後之照相〉、〈宗漢子馬子哇被拘後之照相〉，《申報》，上海，1907年7月20日，版3、4。

清末報紙對新聞照片較被動，至辛亥革命情況發生變化，為滿足讀者對改朝換代的關注，報界刊登照片增多，<sup>28</sup> 也開始主動出擊。革命人物是政界新秀，報

<sup>25</sup> 〈徐錫麟之相〉、〈陳伯平之相〉、〈馬宗漢之相〉，《時報》，上海，1907年7月20日，第一張版2。

<sup>26</sup>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頁108。

<sup>27</sup> 〈女界流血者秋瑾〉，《申報》，上海，1907年7月23日，版4；〈文巡補陸永頤之相〉、《申報》，上海，1907年7月24日，版3；〈秋瑾〉，《申報》，上海，1907年7月27日，版4；〈秋瑾女士之相〉，《時報》，上海，1907年7月22日，第一張版2；〈徐錫麟平時之相〉、〈陳伯平平時之相〉，《時報》，上海，1907年7月25日，第一張版2；〈徐錫麟像〉，《新聞報》，上海，1907年7月19日，版3；〈秋瑾男裝相〉，《新聞報》，上海，1907年7月19日，版2。

<sup>28</sup> 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到1912年2月12日清室退位，上海《申報》刊登辛亥革命相關照片51張、《時報》33張、《民立報》13張。

館少有資料照片只好設法蒐羅，照片取得與製版問題對報館是個難題。如《民立報》<sup>29</sup> 1911年10月14、15日先後刊出黎元洪的圖畫（圖3）及照片（圖4），<sup>30</sup> 二者極為神似，顯示該報14日尚無暇製版，先以畫像代替，並在旁說明「此照係黎四年前贈某國人者，本館用重價購來，明日尚有特別者登之」，15日《民立報》刊出這張照片，當天同版的張彪照片，從簽名日期1907年可看出也是四年前的，報館在照片標題說明這些人物的現時年歲，彌補舊照的遺憾。當時使用照片尚少，報館無法自行照相製版，而是委託外面的製版公司，有些也選擇不另製版，以報紙原有的木雕插圖方式呈現，如《新聞報》的〈武昌革命軍架炮守蛇山之圖〉，就註明臨摩《大陸報》的照片而來。<sup>31</sup>



圖3、〈黎元洪小照〉影像圖

圖4、〈黎元洪〉照片影像圖

資料來源：〈黎元洪小照（插圖）〉，《民立報》，上海，1911年10月14日，版1；〈黎元洪〉，《民立報》，上海，1911年10月15日，版1。

<sup>29</sup> 《民立報》為于右任在1910年10月11日創辦，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成其機關報。民國成立後于右任、宋教仁入閩，《民立報》由范鴻仙主持。1913年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于右任逃往日本，范鴻仙遭暗殺，當年9月4日停刊。

<sup>30</sup> 〈黎元洪小照（插圖）〉，《民立報》，上海，1911年10月14日，版1；〈黎元洪〉，《民立報》，上海，1911年10月15日，版1。

<sup>31</sup> 〈武昌革命軍架炮守蛇山之圖（插圖）〉，《新聞報》，上海，1911年10月20日，版1。



革命首發於湖北武昌，上海報館不惜重金派人前往，展現親臨現場拍攝的能力。1911年10月19日《申報》刊出第一張辛亥革命照片〈蛇山砲台攝影〉，啟事中說明「川鄂事起瞬息萬變，本報特於京漢各埠廣訂特別訪友」。<sup>32</sup> 11月1日《時報》照片〈初七日革命軍砲兵隊與北軍酣戰時之真象〉，註明「本報特派觀戰員之戰地攝影」，強調為報館的第一手資料。<sup>33</sup> 攝影內容包羅萬象，雙方的征戰、<sup>34</sup> 駐營，<sup>35</sup> 革命陣營的安民布告、<sup>36</sup> 錢幣等，<sup>37</sup> 充分滿足讀者的好奇心。

因歐戰爆發攝影原料進口困難，民初上海報紙的新聞照片較沉寂，歐戰結束後才恢復熱絡。如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申報》6日以專電報導天安門遊行及曹汝霖家被焚，<sup>38</sup> 但北京曹宅被焚的照片，因交通限制5月30日才登在上海報紙。<sup>39</sup> 不過上海本地的支援活動，《申報》都能在迅速報導並配上實景照片，如5月26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新聞，27日報導時搭配8張照片。<sup>40</sup> 《申報》當時已常登照片，5月份每天副刊「自由談」都有一張〈古蹟圖〉連載；<sup>41</sup> 除了五四運動，其他各種新聞也登過17張照片。<sup>42</sup> 上海報界使用照片領先全國，筆者檢視天津《大公報》，整個5月份都沒新聞或廣告使用照片。

<sup>32</sup> 〈蛇山砲台攝影〉、〈本報特別啟事〉，《申報》，上海，1911年10月19日，第一張版2。

<sup>33</sup> 〈初七日革命軍砲兵隊與北軍酣戰時之真象〉，《時報》，上海，1911年11月1日，版1。

<sup>34</sup> 〈民軍兵船在武昌攻北軍之攝影〉，《民立報》，上海，1911年10月27日，版1。

<sup>35</sup> 〈漢口民軍駐營圖〉，《申報》，上海，1911年11月11日，第一張版3。

<sup>36</sup> 〈軍政府示〉，《時報》，上海，1911年12月7日，版1。

<sup>37</sup> 〈革命黨之軍用小票〉，《時報》，上海，1911年10月22日，版2。

<sup>38</sup> 〈專電〉，《申報》，上海，1919年5月6日，版3。

<sup>39</sup> 〈五四日曹汝霖宅被毀後攝影：（一）趙家樓曹宅大門〉、〈（二）學生離隊後宅內之狀況〉、〈（三）曹宅內古玩被毀狀況〉、〈（四）曹宅被擊後屋面狀況〉，《申報》，上海，1919年5月30日，版7。

<sup>40</sup> 〈上海學生聯合會宣示典禮〉、〈上海學生宣誓遊行攝影（其一）〉、〈上海學生宣誓遊行攝影（其二）〉、〈上海學生宣誓遊行攝影（其三）〉、〈上海學生宣誓遊行攝影（其四）〉，《申報》，上海，1919年5月27日，版11、19。其中，（其三）與（其四）各有3張照片。

<sup>41</sup> 可能出自攝影畫冊，與「自由談」文章無關，版面調劑之用。每張照片有標題，如1919年5月1日〈古蹟圖七十七〉直隸趙州大石橋、6日〈古蹟圖八十二〉黃鶴樓、13日〈古蹟圖八十八〉杭州冷泉亭，旁有詳細的文字介紹。

<sup>42</sup> 如參加遠東運動會的運動員出發新聞，就搭配2張碼頭登船歡送照，〈遠東運動員出發紀盛〉、〈遠東運動員出發攝影（一）〉、〈遠東運動員出發攝影（二）〉，《申報》，上海，1919年5月5日，版10。

1920年中國第一個日報的攝影附刊出現，6月9日起上海《時報》出版「圖畫週刊」〔按：1924年2月17日起更名「圖畫時報」，以下統稱「圖畫時報」〕。1904年狄楚青創辦《時報》，銷量、歷史不及《新聞報》、《申報》，是上海第三名的報紙，以編排新穎為號召。「圖畫時報」每週日隨報附送，刊登新聞照片為主，分時事、風景、學校、藝術品、名人、風俗6類。「圖畫時報」的推動人是《時報》總編輯戈公振，他同時任「圖畫時報」主編，創刊當天的導言也是他寫的。<sup>43</sup>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表達他對新聞圖照的重視：

文義有深淺，而圖畫則盡人可閱；紀事有真偽，而圖畫赤裸裸表出。蓋圖畫先於文字，為人類天然愛好之物。……為無音之新聞，最能吸引讀者而推廣一報之銷路。……我國報紙之有圖畫，其初純為曆像、生物、汽機、風景之類，鏤以銅版，其費至巨。石印既行，始有繪畫時事者，……惟描寫未必與真相相符。……自照相銅版出，與圖畫以一大革新。<sup>44</sup>

戈公振最初在狄楚青的有正書局圖畫部當學徒，1914年入《時報》，從校對、助理編輯、編輯做到總編輯，<sup>45</sup>在《時報》服務15年。1921年狄楚青將《時報》售予黃伯惠，報紙風格轉變，精縮版面、重視社會、體育新聞等。黃伯惠出身富商家庭愛好攝影，「圖畫時報」得以延續下來，重視圖照的傳統沒變，成為該報的特色。<sup>46</sup>

戈公振1927年到歐美日本考察新聞事業，1928年底回國，跳槽《申報》任總管理處設計處副主任。<sup>47</sup>《時報》重視照片的傳統，隨戈公振帶到《申報》，

<sup>43</sup> 公振，〈圖畫週刊導言〉，《時報》，上海，1920年6月9日，第四張版1。圖畫週刊創刊當天有16張照片，5個廣告。

<sup>44</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頁234。「鏤以銅版」為手工雕刻印刷銅版，「石印」則利用石材吸墨及油水不相容原理，以油性筆在紙上畫圖，再將原稿壓到石版上、刷水、上墨、覆紙加壓得到一張印刷品。「鏤以銅版」與「石印」都是人工雕刻或描繪圖畫，不像照相能直接複製實物。

<sup>45</sup> 般若，〈戈公振與包天笑〉，《時代日報》，上海，1935年10月25日，版5。

<sup>46</sup> 宋三平、張振亭，〈論戈公振與上海時報專刊〉，《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6期（2013年11月），頁104-106。

<sup>47</sup> 報界議論戈公振的跳槽，如不滿黃伯惠將《時報》改成「社會新聞過份描寫」；銀絲，〈戈公振歸國與時報〉，《紅報》，上海，1928年12月21日，版2。戈公振曾因朋友所託，將《時報》照片借給《上海畫報》、《晶報》，被黃伯惠發現；西階，〈戈公振憾

1930年創辦「圖畫週刊」，並間接導致《申報》勁敵《新聞報》同年也出版「圖畫附刊」。<sup>48</sup>

### 叁、照片內容類別分析

為瞭解上海報館使用新聞照片的情形，筆者抽樣上海歷史最老的《申報》，量化每年3月1至10日的新聞照片，不含廣告照片。<sup>49</sup> 會選這個時段，是因該報1949年5月27日終刊，需選較前面的月份，而1、2月會遇到農曆春節，故抽樣3月1至10日，10天超過一週，包含各種星期附刊比較全面。抽樣結果記為表1，因投稿篇幅限制，本文只分析表1的照片內容類別（分述於第參章各節），拍攝者的變化部分，另撰〈近代中國新聞照片拍攝者之研究——以上海報館為例〉一文發表於《興大歷史學報》。

表1、《申報》新聞照片量化統計表

年 代	照 片 數	版 面 數	內 容 類 別							拍 攝 者				
			國 內	國 際	社 會	影 劇	體 育	文 藝	風 景	照 相 館	通 訊 社	投 稿	無 作 者	本 報
1908	1	三張，一張分上下，24小版							1				1	
1909	1	四張，一張分上下，32小版			1								1	

事》，《晶報》，上海，1935年10月26日，版2；《申報》給戈公振月薪「二百餘金」；《中國攝影學會畫報》，上海，1929年1月19日，頁6。

<sup>48</sup> 1930年被稱「畫報年」，上海第四大報《時事新報》10月12日也出版攝影附刊「時事新畫」，至1931年1月21日停刊。

<sup>49</sup> 韓從耀等著《中國現代圖像新聞史（1919-1949）》，第3卷第14章對《申報》新聞照片的量化研究，但只以攝影附刊「圖畫特刊」（1934年3月15日至1937年8月12日）為對象，請參見韓從耀等，《中國現代圖像新聞史（1919-1949）》，第3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65-211。

1910	10	二張，一張分上下，16小版						10					10	
1911	0	二張，一張分上下，16小版												
1912	0	二張，一張4版，8版												
1913	0	8												
1914	51	16			51								51	
1915	0	16												
1916	0	16												
1917	0	18												
1918	0	16												
1919	17	16	10	1					6				17	
1920	13	18	8	2	2			1			5	2	6	
1921	12	16-18	3	9									12	
1922	12	18-20	5	3	3	1						1	11	
1923	8	22-24		3	4	1				2			6	
1924	27	24		17	6	3	1			5			22	
1925	6	18-20		1	1	4				2			4	
1926	7	22-24			5	2				1			6	
1927	43	22-28		2	5	29		7				6	37	
1928	14	22-28	2		6		3	3		4	2		8	
1929	45	28-34	3	3	31	5		3		3		2	40	
1930	41	26-30	2	5	30	1	1	2		3			38	
1931	90	22-36	42	23	11	6	2	5	1	9	1	15	65	
1932	4	6	2	2								1	2	1
1933	27	26-30	2	7	9	6		1	2		2	3	19	3
1934	50	28-32	6	2	32	4	2	4		4		4	39	3
1935	71	26-38	18	6	33	7	5	1	1	2	10	23	35	1
1936	79	22-36	6	11	27	11	7	6	11	1	9	20	47	2



1937	50	22-28		6	8	11	4	12	9	4	2	19	24	1
1938	0	2												
1939	22	22		6	5	11						1	21	
1940	31	12-14	2	3	8	16		2				10	21	
1941	12	12-14	2	1	2	7							12	
1942	23	6		14	2	5			2				23	
1943	31	8	2	4	1								5	2
1944	15	2-4	3	11	1								15	
1945	13	2-4	1	12							1		12	
1946	28	4-6	9	13	2	1			3		3	1	20	4
1947	95	10	15	18	26	4	4	17	11		16	10	32	37
1948	93	8-10	24	16	16		3	3	31		16	4	13	60
1949	76	8	27	22	14	2	6		5		3	5	34	34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申報》，上海，1872-1949年，每年3月1-10日。

## 一、國內新聞

表1《申報》最早的照片是風景類，起自1908年；但其實《申報》最早的照片是國內新聞類，即上章談的1907年徐錫麟案，只是該案在7月，不是筆者抽樣的時段。若論表1的國內新聞類，最早是1919年搭配南北和談新聞、一張〈北方議和代表之一：江君紹杰肖像〉。<sup>50</sup> 從1919-1949的31年裡，《申報》每年3月1-10日共有194張國內新聞照片，平均1天0.63張，頻率不低。

政治人物的行蹤是新聞焦點，以蔣介石為例，1927年他是個火紅新秀，從北伐軍攻克上海、清黨、寧漢分裂、下野、結婚等新聞，常占領報紙版面。有鑑大眾好奇蔣介石的長相，販賣德國藥品「生殖靈」的三德洋行，兩度以蔣介石照

<sup>50</sup> 〈北方議和代表之一：江君紹杰肖像〉，《申報》，上海，1919年3月1日，版10。

片為贈品協助銷售（圖5）。<sup>51</sup> 蔣介石下野後赴日，媒體持續注意其行蹤，日本報紙駐滬記者「均隨之出發」，一到日本「各報館之照相班，已佈滿於旅館門口」。<sup>52</sup> 蔣介石在神戶演說的照片，10天後就登在上海《時報》。<sup>53</sup> 當時政治人物已有媒體曝光意識，如寧漢合流、廣州清共之際，汪精衛、李濟深從廣州乘船，11月18日抵達上海，22日《時報》就刊登汪李輪船上的合照（圖6），拍攝者是汪精衛秘書曾仲鳴，是主動贈予報館刊登的。<sup>54</sup>



圖5、蔣介石先生玉照奉送各界影像圖

資料來源：〈蔣介石先生玉照奉送各界〉，《新聞報》，上海，1927年9月21日，第三張版1。

<sup>51</sup> 〈蔣介石先生玉照奉送各界〉，《新聞報》，上海，1927年9月21日，第三張版1；〈蔣介石先生之結婚近聞〉，《新聞報》，上海，1927年10月3日，第二張版3。

<sup>52</sup> 鮑振青，〈蔣介石到雲仙情形〉，《時報》，上海，1927年10月5日，第一張版2。

<sup>53</sup> 楊蛟雲，〈蔣介石神戶之遊，蔣君於十月九日抵神戶，在中華會館演說，聽者二十餘人，照中中立持杖者即蔣君〉，《時報》，上海，1927年10月19日，第一張版4。

<sup>54</sup> 曾仲鳴，〈汪精衛李濟深在廣州〉、〈汪精衛李濟深在亞細亞皇后船中〉，《時報》，上海，1927年11月22日，第一張版4。



圖6、汪精衛、李濟深在亞細亞皇后船上照片影像圖

資料來源：曾仲鳴，〈汪精衛李濟深在亞細亞皇后船中〉，《時報》，上海，1927年11月22日（時報新光第159期），第一張版4。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更受媒體關注，宋美齡照片成為各報本埠記者的爭奪焦點。《新聞報》記者顧執中因教會而與宋美齡熟識，得知蔣宋訂婚立刻去宋宅採訪，向宋要張近照刊登（圖7），<sup>55</sup> 成為上海獨家，「上午八、九時報紙已被購買一空，報販多次請求添印，這天的《新聞報》，銷數增加了好幾萬份」。<sup>56</sup> 《時報》記者金雄白因聽過宋美齡布道而認識宋，蔣宋結婚前夕，「沒有一天不往西摩路宋宅守候」，「有一次與在《時報》擔任攝影的張有德同去，還在庭園竹籬前攝得了不少他們的雙雙儷影」，<sup>57</sup> 蔣介石婚後的新宅也曝光。<sup>58</sup> 《申報》照片刊登較遲，婚禮前夕才透過《上海畫報》攝影黃梅生得到蔣宋兩人的合照（圖8），黃梅生特別說明：

<sup>55</sup> 〈蔣宋已正式訂婚〉、〈蔣介石先生宋美齡女士近影〉，《新聞報》，上海，1927年10月13日，第四張版1。

<sup>56</sup> 顧執中，《報海雜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7-18。

<sup>57</sup> 金雄白，《記者生涯五十年》，上集（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77年），頁209。

<sup>58</sup> 〈蔣介石預備結婚之新宅在上海環龍路〉，《時報》，上海，1927年11月13日，第一張版4。

連日各報記者往宋宅要求攝蔣宋合影者甚眾，愚先攝得，故昨日本報與《上海畫報》所刊照片，均余所攝贈也。<sup>59</sup>

天津《大公報》記載此合照得來不易：

近日與宋女士稔之某照相館，電話告女士，願為攝影。女士欣諾之，曰將軍亦在此，速來可也。照相者至，先拍一紙，猶以為請，將軍略有難色，女士顧蔣曰：同拍何妨？將軍不能違女士意也，是日共拍數幀，儀態萬方，但約以必結婚日始能披露，《上海畫報》得之。<sup>60</sup>

由上可知，新聞照片的取得，除攝影能力外，與被拍對象的關係也是重要因素。



圖7、蔣介石先生、宋美齡女士近影影像圖

資料來源：〈蔣介石先生宋美齡女士近影〉，《新聞報》，上海，1927年10月13日，第四張版1。

<sup>59</sup> 〈蔣宋結婚前之儷影〉，《申報》，上海，1927年11月30日，版14，標示的拍攝者「王梅生」應為黃梅生之誤。次日照片標示「黃梅生攝」，梅生，〈中美姻緣小志〉、〈蔣介石將軍與宋美齡女士合影〉，《申報》，上海，1927年12月1日，版17。

<sup>60</sup> 〈蔣婚雜話〉，《大公報》，天津，1927年12月2日，版2。消息來源是「昨日自滬來津者，談蔣宋籌備婚事」。





圖8、蔣宋結婚前之儷影影像圖

資料來源：〈蔣宋結婚前之儷影〉，  
《申報》，上海，1927年  
11月30日，版14。

12月1日結婚當天，宋宅的教會儀式與大華飯店的婚宴沒有公開，只提供中華照相館的照片。<sup>61</sup>但媒體各出奇招，《新聞報》刊登結婚證書、證婚人、禮車照片，<sup>62</sup>《時報》則出動兩位攝影記者，拍了結婚燈籠、禮車、飯店門口、禮堂內部、參加來賓等照。<sup>63</sup>

當政治人物越來越重要，新聞版面越多，採訪與拍攝卻更困難，如1947年《申報》攝影記者顧廷鵬分享拍蔣介石的經驗。第一，不是想拍就去，蔣介石要蒞臨哪個會場，要先向該單位申請攝影證方能入場。第二，服裝需整齊，「最好穿著西裝，純粹以一個新聞攝影記者的姿態出現」，皮鞋要軟橡皮底，因攝影記者常變換角度拍照，皮鞋太吵會「受到侍衛人員的阻止，甚至被驅除出去」。「手裡的照相機，應使它很明顯地暴露著」，讓大家知道你是攝影記者；但也不要帶太多，衣服口袋不能塞滿東西，「膨脹得使侍從警衛人員發生什麼懷疑」。第三，舉止要有禮節，不能慌張地跑在要人前面，應輕輕迂迴地從側面轉到前面去拍照。拍照前、使用鎂光燈前要先示意，讓人有心理準備。第四，要與侍從警衛打點好關係，才會「給你特殊的方便」，能拍時主動「來電話邀你去攝影」，拍攝時「讓開幾個地位給你，陪你走到相當近的距離去攝影」。侍衛人員對陌生的攝影記者雖不會硬性阻止，但會嚴密地暗中監視，擋在你鏡頭前面，「不會使你能十分接近地攝影」。

<sup>61</sup> 〈蔣宋禮成後之儷影〉，《新聞報》，上海，1927年12月2日，第四張版2。

<sup>62</sup> 〈證婚人李德全女士〉、〈新人所乘之汽車〉、〈蔣中正先生宋美齡女士結婚證書〉，《新聞報》，上海，1927年12月2日，第四張版2。

<sup>63</sup> 張有德，〈雙喜花盾〉、〈新郎及來賓在禮堂中〉、〈大華飯店門首熱鬧情形〉，《時報》，上海，1927年12月2日，第一張版4；金雄白，〈宋老夫人〉、〈證婚人何香凝〉、〈孔庸之及宋子文夫人〉、〈新人乘坐之花車〉，《時報》，上海，1927年12月2日，第一張版4。

一般中國報館攝影記者只能拍蔣介石公開出席的場合，蔣介石夫妻的日常生活照，<sup>64</sup> 由侍從室和勵行社負責。一般報館攝影記者，若遇到蔣介石夫妻「情緒極愉快的時候，經過最接近主席的人員允許和代為請求後」，或許可拍到這種難得的照片；但拍攝生活照的機會，「外國籍攝影記者反比中國籍攝影記者要容易一些」。顧廷鵬認為，「主席夫婦對攝影是很愛好的，尤其是蔣夫人對攝影，特別愛好，且極內行」。拍完後要擇美照刊出，再透過「侍從室的關係」將照片送給蔣介石夫妻，未來拍照工作會更便利。<sup>65</sup>

國內政治照片還有個觀察點，即報社本身立場的作用。以1913年宋教仁案為例，他當時是國民黨代理理事長，3月20日晚間乘火車北上，在上海火車站驗票口處遭到槍擊，22日傷重不治。上海各報立刻投入報導，<sup>66</sup> 《新聞報》、《申報》、《時報》每日新聞追蹤，<sup>67</sup> 但都沒搭配照片，反倒是與國民黨關係深厚的《民立報》刊登許多照片，如靈堂、各式宋案證據等，<sup>68</sup> 最著名是為「留歷史上哀慟紀念」，入殮前特別拍攝宋教仁遺體赤身露出肚上傷痕、穿上禮服等照，<sup>69</sup> 做強烈的視覺控訴。

值得注意的是，《申報》、《時報》對宋案新聞雖無照片搭配，但並非沒有刊登照片的習慣，當時《申報》副刊「自由談」每天都有作家照片，《時報》則

<sup>64</sup> 每家報刊各有人脈，《良友畫報》主編馬國亮回憶，該刊透過蔣介石姪子蔣仲琪得到蔣介石夫婦的私人生活照。見馬國亮，《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臺北：正中書局，2002年），頁227-228。

<sup>65</sup> 顧廷鵬，〈我怎樣拍攝主席夫婦的新聞照片〉，《申報館內通訊》，第1卷第3期（1947年3月），頁23-25。

<sup>66</sup> 因宋教仁服務過《民立報》，該報獨得許多內部消息，是唯一21日就報導被刺新聞的報紙，〈宋教仁之被狙擊〉，《民立報》，上海，1913年3月21日，頁10。

<sup>67</sup> 〈宋教仁突遭狙擊駭聞〉，《新聞報》，上海，1913年3月22日，版1；〈宋教仁被刺詳誌〉，《申報》，上海，1913年3月22日，版10；〈宋教仁遇險記〉，《時報》，上海，1913年3月22日，版7。

<sup>68</sup> 〈宋漁父先生遺像〉，《民立報》，上海，1913年3月23日，頁11。《民立報》說明是前幾天記者向宋教仁本人索取的近照，「今瞻矚遺像，蓋不禁淚涔涔下矣。」

<sup>69</sup> 〈宋先生死不瞑目〉，《民立報》，上海，1913年3月23日，頁2；〈宋先生傷痕攝影一〉、〈宋先生傷痕攝影二〉，《民立報》，上海，1913年3月24日，頁10；〈宋先生去世後之攝影〉、〈宋先生去世後之攝影（二）〉，《民立報》，上海，1913年3月25日，頁10。

偶有國內外新聞照片。<sup>70</sup>《民立報》出於與宋教仁的關係大刊照片，但筆者檢視宋案發生前、案情冷卻後，《民立報》不常看到照片，可見是出於政治宣傳目的、及有革命黨淵源易取得照片。

## 二、國際新聞

表1的國際新聞類，最早一張是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法國總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照片，旁邊搭配〈歐和會長法總理克勒滿沙之小史〉新聞。<sup>71</sup>從1919-1949的31年裡，《申報》每年3月1-10日共有223張國際新聞照片，平均1天0.72張，頻率頗高且逐漸增加。

多數國際新聞照片沒標示攝影者，是報館資料室的照片。因新聞可透過電報傳遞，但照片需從遙遠的外國寄來，兩者時間無法配合。如1936年3月日本首相換成廣田弘毅，9日才正式上任，《申報》6日就經「同盟社5日東京電」傳來新聞，消息迅速，報館為幫這則新聞增色，找來廣田弘毅、松平恆雄（新任宮內大臣）的大頭照，<sup>72</sup>讓讀者瞭解日本政界的變化。

在外國現場拍攝的時事照片，中國報館取得的時間距新聞發生已久，就以照片加簡單標題的方式呈現。如1931年3月8日《申報》「圖畫週刊」第二版，刊登8張國際新聞照片：〈倫敦印度圓桌會1月19日〉、〈巴拿馬共和國1月2日革命〉、〈德意志帝國1月18日60週年紀念〉等，<sup>73</sup>事隔已兩個月，算給讀者複習歐洲舊聞。

<sup>70</sup> 宋案發生後的3月23至31日，《申報》每天第十或第十三版的副刊「自由談」都有張作家大頭照，照片旁介紹其姓名住址，同版沒搭配該作者的文章，僅作補白刊出，如3月23日照片為〈投稿者丁悚〉。國際新聞照片有〈巴爾幹戰場莫烈斯底〉，《時報》，上海，1913年3月22日，版2；〈九龍會匪蕪湖首領邢蕩湖〉，《時報》，上海，1913年3月26日，版2。

<sup>71</sup> 〈歐和會長法總理克勒滿沙之小史〉，《申報》，上海，1919年3月1日，版6。

<sup>72</sup> 〈日本新任首相廣田弘毅〉、〈新任宮內大臣松平恆雄〉，《申報》，上海，1936年3月6日，版5。

<sup>73</sup> 〈倫敦印度圓桌會1月19日〉、〈巴拿馬共和國1月2日革命〉、〈德意志帝國1月18日60週年紀念〉，《申報》，上海，1931年3月8日，圖畫週刊版2。

照片若要與新聞一起刊出、達到圖文並茂的效果，兩者會有時間差，且地點殊異。如1946年3月7日《申報》〈法兵在海防強行登陸，與我守軍一度衝突〉新聞，消息來源是「中央社河內6日電」，為1天前越南的新聞，非常即時。但搭配這則新聞的照片，是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與法國大使簽中法新約的照片，時間為2月28日，地點在中國重慶。<sup>74</sup> 由於無法同步取得河內衝突的現場照片，報館拿一週前的相關照片來搭配，是折衷作法。

筆者在1941年3月1日《申報》看到一張電傳照相（無線電傳真，本文第肆章會詳述），雖節省時間，但手續繁瑣價格高昂，中國報界只偶一為之。1941年3月1日《申報》這張是希特勒（Adolf Hitler）2月24日在德國慕尼黑的演說照片，<sup>75</sup> 與事件發生僅隔5天。

抗戰後期的《申報》國際照片比較特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開進租界，上海孤島時代結束，《申報》變成日偽報，常歌頌大東亞戰爭。1943-1945年的國際照片成為日軍的展示現場，畫面清晰版面很大，標題為日軍宣傳，如〈威鎮海面的日本砲艦隊〉、<sup>76</sup> 〈忠心為國之日陸軍士兵〉、〈敵艦在勇士敢死轟炸下一沉沒〉等，<sup>77</sup> 試圖向讀者心戰喊話。

抗戰結束後，《申報》國際新聞照片更趨多元，有幾個新變化。第一，開始有報館派駐外國的記者寄來照片，<sup>78</sup> 如1947年3月9日《申報》報導荷蘭第四女王孫慶典，消息來源是「2月28日萊汀市航訊」。這則新聞搭配兩張照片，〈荷蘭青年參加慶典大遊行〉來自「本報特約記者王一之」，新聞也是他寫的；《申報》又加刊資料室收藏的〈荷蘭第四女王孫〉大頭照，讓新聞更完整。<sup>79</sup> 因經費有限，當時中國報館的駐外國記者多非全職，而是報館特約中國駐各國使館人員或留學生兼任的。<sup>80</sup>

<sup>74</sup> 〈法兵在海防強行登陸，與我守軍一度衝突〉，《申報》，上海，1946年3月7日，版2。

<sup>75</sup> 〈希特勒在慕尼黑演說之電傳照相〉，《申報》，上海，1941年3月1日，版6。

<sup>76</sup> 〈威鎮海面的日本砲艦隊〉，《申報》，上海，1943年3月6日，版3。

<sup>77</sup> 〈忠心為國之日陸軍士兵〉，《申報》，上海，1944年3月10日，版4；〈敵艦在勇士敢死轟炸下一沉沒〉，《申報》，上海，1945年3月10日，版4。

<sup>78</sup> 潔，〈照片分類與管理〉，《申報館內通訊》，第2卷第3期（1948年3月），頁41。

<sup>79</sup> 〈荷蘭青年參加慶典大遊行〉、〈荷蘭第四女王孫〉，《申報》，上海，1947年3月9日，版7。

<sup>80</sup> 凌滄，〈談新聞攝影〉，《天津民國日報畫刊》，第5期（1946年1月1日），頁2。



第二，開始與外國報紙合作，請其提供照片，如1947年3月1、3日《申報》〈美陸軍在阿拉斯加試驗〉、〈美國最新式之機關車〉，署名都是「本報特約《紐約時報》攝寄」。<sup>81</sup>《紐約時報》是創於1851年的著名美國報紙，與這家具全球影響力的報紙合作，《申報》無疑擴大新聞版圖。不過礙於照片是用寄的，筆者看到《紐約時報》提供的照片，是沒時效性的內容，如〈美國自動售書機〉、〈蘇聯烏拉爾工業區〉等。<sup>82</sup>

第三，部分外國大使館新聞處開始向中國報界提供照片，如1948年3月3、4日《申報》刊出〈英國文化委員會近在倫敦招待中國學生〉、〈蒲立特出席眾院作證〉，兩照分別註明「英國新聞處贈」、「美國新聞處」，<sup>83</sup>可見戰後英美政府對華新聞宣傳上的努力。據《申報》檔案，1946年該報訂了20家通訊社，每家的「按月稿費」都有記載，只有英國新聞處、美國新聞處兩家寫「不計」，<sup>84</sup>可知照片是免費提供的，對《申報》自然不無小補。

### 三、社會新聞

社會新聞又叫本埠新聞，是報館所在地的新聞，讀者最關心、記者也跑得最勤。表1的社會新聞類，最早一張照片是1909年上海〈信成銀行之寫真〉，搭配〈記信成銀行股東大會〉新聞。<sup>85</sup>從1909-1949的41年裡，《申報》每年3月1-10日共有342張社會新聞照片，平均1天0.83張，是所有類別中最高的，與照片取得的便利性有關。時段上1928-1937年是刊登高峰，《時報》金雄白認為此時國民黨實行訓政，政治新聞空間壓縮，只好往社會新聞去發揮：

<sup>81</sup> 〈美陸軍在阿拉斯加試驗〉，《申報》，上海，1947年3月1日，版3；〈美國最新式之機關車〉，《申報》，上海，1947年3月3日，版3。

<sup>82</sup> 〈美國自動售書機〉，《申報》，上海，1947年3月7日，版9；〈蘇聯烏拉爾工業區〉，《申報》，上海，1947年3月10日，版3。

<sup>83</sup> 〈英國文化委員會近在倫敦招待中國學生〉，《申報》，上海，1948年3月3日，版6；〈蒲立特出席眾院作證〉，《申報》，上海，1948年3月4日，版1。

<sup>84</sup> 「通訊社一覽」（1946年5月31日），〈上海各報動態各報負責人及編輯採訪名單申報駐外人員通訊錄〉，《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13。

<sup>85</sup> 〈信成銀行之寫真〉、〈記信成銀行股東大會〉，《申報》，上海，1909年3月2日，第三張版3。

什麼政治部、市政府、市黨部……，每天都有一個工作報告來，……都非登不可，報紙弄成了一本流水帳。……報紙不是贈閱的，……所以為了調劑枯燥的版面，我主張多登一些社會的動態。<sup>86</sup>

表1的342張社會新聞照片可分四類，第一類火災犯罪市政，占全部24.5%。大眾對災異充滿好奇，如1923年〈閩北被害巡警之慘狀〉照片，對著屍體近距離拍攝，畫面駭人。<sup>87</sup> 1928年〈北京路怡和房子火警攝影〉，照片是濃煙密布的房子，讓人感受火場的緊張。<sup>88</sup> 1947年〈徐維震氏近影〉，搭配高等法院院長昨天被綁架的新聞，請讀者一起關注。<sup>89</sup> 1949年通貨膨脹金融不穩，上海銀元販子沿街兜售，照片非常寫實。<sup>90</sup>

第二類是名人動態，占全部21%。名人是大眾關注的話題，記者常守在碼頭、車站，第一時間抓到名人的畫面，如1936年美國提倡節育的山額夫人（Margaret Higgins Sanger）來上海，第二天《申報》刊出她剛下輪船的照片。<sup>91</sup> 1948年《申報》記者探得吳國楨市長夫婦赴杭州養病，趕到火車站市長夫婦已經上車，記者立刻跟上火車採訪並合影。<sup>92</sup> 一位攝影記者分享拍攝名人要「膽子大」，並利用對方的「虛榮心」：

我知道人們也是喜歡出風頭的，所以我在有要人來時，總是到車站闖上去照，有的時候衛隊想干涉我，可是那要人卻阻止了他，任我照了。<sup>93</sup>

有些人則想變成名人，利用報紙曝光增加其事業與名望，《申報》這種某人結婚、留學、開業的報導很多，搭配一張大頭照，多是其主動提供，如1925年

<sup>86</sup> 金雄白，〈談辦報〉，《古今半月刊》，第20、21期（1943年4月16日），頁19。

<sup>87</sup> 〈閩北被害巡警之慘狀（一）賈富明〉、〈閩北被害巡警之慘狀（二）張鳳嶺〉，《申報》，上海，1923年3月8日，版13。

<sup>88</sup> 林澤蒼，〈北京路怡和房子火警攝影〉，《申報》，上海，1928年3月4日，版14。

<sup>89</sup> 〈徐維震氏近影〉，《申報》，上海，1947年3月5日，版10。

<sup>90</sup> 〈街頭銀元市場中之交易情形〉，《申報》，上海，1949年3月3日，版4。

<sup>91</sup> 〈山額夫人抵滬留影〉，《申報》，上海，1936年3月9日，版8。

<sup>92</sup> 〈吳市長夫婦在車廂中留影，車窗外最左之一人為市府歐陽處長〉，《申報》，上海，1948年3月10日，版4。

<sup>93</sup> 天勝，〈一位攝影記者底自白〉，《攝影畫報》，第12卷第19期（1936年6月20日），頁750。

〈劉孝權君與龔安慧女士結婚儷影〉，旁有新郎新娘簡介；<sup>94</sup> 1927年眼科醫師吳雲章照片，介紹他留日歸國即將開業；<sup>95</sup> 1936年〈吳復初律師近影〉，報導其律師樓遷到什麼地址。<sup>96</sup>

第三類是機關組織集會照片，占全部13%，如1933年〈市民提倡國貨會徵求會員大會〉照片，集會時間是前日傍晚6點，次晨《申報》就刊出。<sup>97</sup> 第四類是走失人口的照片，數量很多占41.5%，如1914年的社會新聞類，全是救濟婦孺會的走失兒童，照片下記錄姓名、年紀、籍貫，供人協尋辨認。<sup>98</sup>

上海前兩大報《新聞報》、《申報》的社會新聞還算節制，銷量第三的《時報》為求競爭，在這種新聞下猛藥，「有人稱之為『黃報』，這是一語雙關，既指主辦人姓黃，也指其刊登黃色新聞」，「標題常用聳人聽聞的詞句、驚嘆號」，「是國內第一家套印紅色標題的報紙」。<sup>99</sup> 《時報》金雄白回憶：「取法美國報紙的社會新聞，每一起有重要性或趣味性的新聞，都加以生動描寫。」如劉海粟美術專門學校使用裸體模特兒，「第一砲就引起了讀者的注意」；之後石女丈夫要求離婚案、汪世昌馬振華自殺案、黃慧如、陸根榮主僕戀等；「男女桃色新聞的事件」，「讀者們不僅當它是新聞，也且當它是小說，於是爭相購」。<sup>100</sup> 據上海《新聞記者》月刊調查，上海商家的伙計最愛看《時報》，「因在社會新聞紀載詳細，並有照片的緣故」。<sup>101</sup> 江浙土匪首領太保阿書（本名徐天雄）落網，1931年4月16日斬首示眾，次日《時報》整版報導，圍觀處決的群眾（圖9）、太保阿書的遺書、行刑前的跪地綑綁（圖10）、身首分離的剎那等照，配合文字新聞說明，使人如臨其境。<sup>102</sup>

<sup>94</sup> 中華照相館，〈劉孝權君與龔安慧女士結婚儷影〉，《申報》，上海，1925年3月7日，版7。

<sup>95</sup> 〈下圖為吳君近影〉，《申報》，上海，1927年3月2日，本埠增刊版2。

<sup>96</sup> 〈吳復初律師近影〉，《申報》，上海，1936年3月1日，版15。

<sup>97</sup> 〈市民提倡國貨會徵求會員大會〉，《申報》，上海，1933年3月10日，版9。

<sup>98</sup> 〈救濟婦孺會之留影〉，《申報》，上海，1914年3月5、9日，版13。

<sup>99</sup> 袁義勤，〈黃伯惠與時報〉，《新聞大學》，1995年夏季號（1995年無月份），頁42-43。

<sup>100</sup> 金雄白，《記者生涯五十年》，上集，頁182；朱子家（金雄白），《黃浦江的濁浪》（香港：吳興書報社，1964年），頁35-36。

<sup>101</sup> 萬葉，〈上海讀者和上海報紙〉，《新聞記者》，上海，創刊號（1937年6月），頁13。

<sup>102</sup> 〈看殺人〉、〈兩句良心話，一首歪扯詩〉、〈太保阿書與徐福生發綁後，預備槍決〉、〈太保阿書，一剎那間身首分離〉，《時報》，上海，1931年4月17日，版5。



圖9、群眾圍觀處決太保阿書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看殺人〉，《時報》，上海，1931年4月17日，版5。



圖10、太保阿書與徐福生預備槍決影像圖

資料來源：〈太保阿書與徐福生發綁後，預備槍決〉，《時報》，上海，1931年4月17日，版5。



《時報》重視女性照片，自第一代老闆狄楚青即是如此。《小說時報》（1909-1917）、《婦女時報》（1911-1917）是《時報》附屬文藝雜誌，狄楚青以刊登時裝美人照吸引讀者，《婦女時報》在《時報》的廣告羅列下期女性照片姓名以為號召。<sup>103</sup>《時報》記者包天笑回憶他張羅女性照片的艱辛，「當時閨閣中人，風氣未開，不肯以色相示人」，只好向妓女徵求照片，甚至「因《小說時報》徵求照片而獵豔」。但妓女有照片的不多，狄楚青動用自家的民影照相館幫妓女拍照。民影照相館原是狄楚青為有正書局拍攝名畫而設的，<sup>104</sup>現也可幫妓女拍照，方式有二，在民影照相館應酬花酒，妓女應召順便拍照，另一是發照相券給妓女，二者皆免費。<sup>105</sup>當時底片多存放照相館，民影照相館為安人心，登報廣告強調「照片登報須經本人應許」，否則「照片絕不漏出」。<sup>106</sup>

第二代老闆黃伯惠接手《時報》後，登膩妓女、女明星、交際花、舞女，認為女學生才是首選，「時時拿著照相機，坐著汽車，親自到女校攝影，回來後親自洗曬製版，十分賣力」。<sup>107</sup>但女學生照片取得不易，《良友畫報》編輯曾說：

「良友」登過女子照片不少，就封面說，多用女明星照片。記的有一次曾用一女中學生照片，大概未得她完全同意，後來受她嚴厲的責備。她責備的態度，很可以代表一般人的心理。凡刊在畫報的女人像，除了鶴髮雞皮的外，都是下流，壞品，賤格。<sup>108</sup>

中西、晏摩氏、聖瑪利亞三家上海貴族女校，校長非常保守，「不容許學生的照片公開登報」，不准畢業典禮來賓帶相機。《時報》金雄白想出奇招，1926年打聽到晏摩氏女校鋼琴科毛月娥有獨奏會，特去採訪並全版報導，毛月娥高興之餘

<sup>103</sup> 〈婦女時報第九期出版〉，《時報》，上海，1913年3月1日，版1。

<sup>104</sup> 有正書局最早引進珂羅版印刷術，珂羅是希臘語「膠」（collo）的音譯。在玻璃塗明膠製成感光印版，將底片貼合曝光，受光部分膠層硬化，以產生的細紋吸收油墨完成印刷，畫質精緻印量不高，一般用在藝術品的印刷。

<sup>105</sup>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60-464、484-486、528、531。

<sup>106</sup> 〈照片登報須經本人應許〉，《時報》，上海，1913年3月1日，版9。

<sup>107</sup> 顧執中，《報海雜憶》，頁179。

<sup>108</sup> 〈致讀者〉，《良友畫報》，上海，第11期（1926年12月），頁1。

動員女同學到《時報》拍照。《時報》在報館三樓設照相室，「三面都是落地大玻璃，用以吸收光線」，<sup>109</sup>「化裝室、更衣室齊備，因此社團活動，常被招待至《時報》攝影部」。<sup>110</sup>

## 四、影劇新聞

上海是近代中國最大港埠及商業都市，娛樂事業蓬勃發展，電影、戲劇、歌舞已成民眾重要的精神食糧。為滿足民眾對娛樂情報的需求，報刊的影劇版面日益豐富，從新片介紹、明星近況到影劇廣告，常以照片生動報導。

表1的影劇類，最早一張照片是1922年的〈卓別靈之小影〉，旁邊搭配新聞。<sup>111</sup>從1922-1949的28年裡，《申報》每年3月1-10日共有137張影劇照片，平均1天0.49張。這137張照片裡，戲劇（京劇、地方戲曲、話劇、歌舞）28張占20%，電影109張占80%，顯示電影成為上海市民的娛樂選項。

電影照片包含洋片及國片，為電影公司提供的劇照，有的搭配影評，如〈奧迪生大光明今日開映影片「翼」〉，照片是天空中遨翔的飛機，新聞詳述電影如何運用特技拍攝「飛機大戰」，保證驚險刺激。<sup>112</sup>有的僅一張劇照，但會有文字標題，告訴讀者是哪家電影公司出品？如〈明星新片「梅花落」之一幕〉；或在上海哪家電影院上映？如〈夏令配克將映「為人作嫁」之一幕〉，<sup>113</sup>同樣具有廣告效果。另種是明星或電影公司提供的明星宣傳照，如〈美國著名女演員考倫穆亞之近影〉、〈美國第一國家公司女演員考賓肖影〉；<sup>114</sup>也有攝影記者拍的，如〈健美的胡蝶〉，署名「張文傑攝於香島胡寓門首」。<sup>115</sup>當時還不流行偷拍明

<sup>109</sup> 金雄白，《記者生涯五十年》，上集，頁116、136-138。

<sup>110</sup> 邵翼之，〈我所知道的上海時報〉，《報學》，第8期（1955年12月），頁77。

<sup>111</sup> 〈卓別靈之小影〉，《申報》，上海，1922年3月10日，版15。

<sup>112</sup> 〈奧迪生大光明今日開映影片「翼」〉，《申報》，上海，1929年3月1日，本埠附刊版5。

<sup>113</sup> 〈明星新片「梅花落」之一幕〉、〈夏令配克將映「為人作嫁」之一幕〉，《申報》，上海，1927年3月1、2日，本埠附刊版1。

<sup>114</sup> 〈美國著名女演員考倫穆亞之近影〉、〈美國第一國家公司女演員考賓肖影〉，《申報》，上海，1927年3月5日，本埠附刊版5。

<sup>115</sup> 〈健美的胡蝶〉，《申報》，上海，1940年3月7日，版14。

星私生活，攝影記者拍照都在明星同意下進行。明星需打歌打片，也願與攝影記者合作；如女星張織雲常以〈新裝束〉為名拍照，<sup>116</sup> 藉展示時尚新裝增加曝光機會。1936年《女神》雜誌記錄攝影記者拍攝女星的各種姿勢：（圖11）為求拍攝角度變化多端，攝影記者「像猴子似的爬到樹枝上去」，由上往下俯拍；（圖12）想呈現女星在沼澤邊的照片，攝影記者竟捲起褲管站到水裡。<sup>117</sup>



11

12

圖11、攝影記者爬樹為女明星拍照的影像圖

圖12、攝影記者涉水為女明星拍照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攝影記者與女明星〉，《女神》，第8期（1935年12月1日），頁1-2。

明星需維持良好形象，攝影記者抓住此心態，遇到女明星不肯被拍，《申報》攝影記者分享一種「逼上梁山法」：

你可以好好告訴她，我們報館裡原有一張你的照片，所以不攝也可以；但那張照片是五年前拍的，顏色已經泛黃，而且也很老醜，衣服也怪裡怪樣的；如果你不肯拍，那末我們只好仍用那張舊的了。如此一說，她就肯拍了。<sup>118</sup>

<sup>116</sup> 〈新裝束〉，《申報》，上海，1927年3月4、6日，本埠附刊版1、2。

<sup>117</sup> 〈攝影記者與女明星〉，《女神》，上海，第8期（1935年12月1日），頁1-2。

<sup>118</sup> 君默，〈攝影記者的難題〉，《申報館內通訊》，第2卷第8期（1948年8月），頁32-33。

大明星一出現就被照相機追逐，「要這許多攝影記者雲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夠紅才行，如女星李麗華出現就「被大群攝影記者包圍」。<sup>119</sup> 女星黎明暉被「一位眼明手快的攝影記者發現」，「別的攝影記者也都如蠅附羶，越聚越多」，引起黎明暉的抗議：

要拍照儘管拍照，不過也應顧到我的自由，照這樣包圍著，卻把我的自由完全剝奪，……可惡的攝影記者，真是惹厭煞人呢！

有人拍表示有人氣，明星對攝影記者又愛又恨，照片裡的黎明暉還是對著鏡頭笑了（圖13）。<sup>120</sup>

影劇照片還有個特色，就是集中放在報紙的最後那疊。因工商業發展廣告漸多，中國前兩大的日報上海《新聞報》、《申報》1920、30年代出現「本埠增刊」〔按：《申報》1924年2月8日起〕或「本埠附刊」〔按：《新聞報》1926年4月1日起〕。《新聞報》協理汪仲韋表示：「當報紙銷路發展到一定數量，廣告越來越多，勢必增加張數。超過五大張，售報收入就要不夠紙張成本，這是一個矛盾。」<sup>121</sup> 報館準備科以每天收到的廣告量，精心計算次日應出報多少張，才能在廣告收入與紙張支出間取得最大利益。<sup>122</sup> 發覺部分廣告（如電影戲院廣告、無全國市場的小商品廣告）對外埠讀者無用，故推出這種附刊，隨報附送不銷外埠。因只有本埠讀者看到，「本埠附刊」的廣告刊例較正張便宜，至1937年8月上



圖13、黎明暉近影影像圖

資料來源：〈黎明暉近影〉，《社會日報》，上海，1933年5月9日，版2。

<sup>119</sup> 〈攝影記者包圍李麗華〉，《中聯影訊》，上海，第31期（1943年1月20日），頁3。

<sup>120</sup> 帆影，〈攝影記者包圍黎明暉〉、〈黎明暉近影〉，《社會日報》，上海，1933年5月9日，版2。

<sup>121</sup> 汪仲韋，〈我與新聞報的關係〉，《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1輯（1982年5月），頁134。

<sup>122</sup> 陶菊隱，〈我所瞭解的新聞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6輯（1981年12月），頁106-107。



海成為戰地，報紙無法銷往外埠才停發。<sup>123</sup>「本埠附刊」為增加廣告收入而生，內容自然偏向客戶，業配味濃厚。而影劇照片主要刊登在這裡，故多是電影公司、明星主動提供的劇照、宣傳照，《新聞報》協理汪仲章表示：

我們闢這附刊，是專為戲館、電影院等遊藝事業服務的，……所以影評都只是談優點不談缺點，因為他們花錢登巨幅廣告，為的是要賣座，如果報館要求過高，評論他們的作品，……勢必影響營業，從而也就降低登廣告的溫度。<sup>124</sup>

## 五、體育新聞

拍攝運動照片最好在比賽進行的時候，才可展現「力」與「美」。<sup>125</sup>賽場若與報館同地，當然能到現場拍回照片；但若比賽在別地舉行，因照片拍好要先沖洗出來、寄回報館再製版印刷，有些報館就不提供現場照片，而採事前擺拍的方式。天津《大公報》徐鑄成1929年去瀋陽採訪華北運動會，賽前打聽好各類比賽成績優異者，約拍幾張穿著賽衣、在場上的跑跳的照片，事先寄回天津報館，待比賽結果出來，再擇優勝者的照片刊出。<sup>126</sup>

在別地舉辦的體育比賽，照片若要與新聞在次日見報，需費不少功夫。上海《時報》老闆黃伯惠喜愛攝影重視體育新聞，1930年4月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在杭州舉辦期間，就不惜血本追蹤報導。黃伯惠親到杭州賽場指揮，同時向鐵路局包好一節車廂，車內布置暗房，每天賽程結束，所有攝影、記者坐上駛滬班車，在車中展開作業。火車開到嘉興時，僅留一人繼續坐到上海，其他人員乘反向車回杭州，明天繼續工作。因照片、稿件在車上已弄好，車到上海即可送入報社趕印。<sup>127</sup>黃伯惠又與航空公司訂約，全運會10天內包機一架，每晨自上海空運《時

<sup>123</sup> 陶菊隱，〈新聞報發家史〉，《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60年5月），頁140。

<sup>124</sup> 汪仲章，〈新聞報發展過程拾零〉，《新聞研究資料》，總第23輯（1984年1月），頁200。

<sup>125</sup> 毛松友，〈新聞攝影概論〉，《黑白影集（上海）》，第3期（1936年），頁83。

<sup>126</sup> 徐鑄成，《報海舊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53。

<sup>127</sup> 配合運動會賽程，拍照工作每日下午五、六時才結束，因飛機不能夜間飛行，故用火車將照片帶到上海，但火車經常脫班，有時抵達上海報館很晚，製版時間非常匆促；〈火車時常脫班，照片不能多印〉，《時報》，上海，1930年4月12日，版3。

報》到杭州，<sup>128</sup> 並規定10天內航空公司不得接受其他客戶包機飛杭。次日清晨當其他上海報紙剛印出時，圖文並茂的《時報》已在杭州被讀者搶購一空。<sup>129</sup> 全運會場上《時報》狂賣，「各處看客運動員咸一擁爭購，閱二十分鐘，即已售罄，有購不到而起口角者」，連大會主席蔣介石夫婦也被捕捉到閱讀《時報》的畫面。<sup>130</sup> 賽後《時報》老闆黃伯惠在西湖舉行宴會，蔡元培致詞時誇讚該報：

現在世界趨重科學，抽象的事物，恆不敵具體者之易於動人觀感。……  
今《時報》寫實之照片獨多，增加新聞之價值不少，此次大會特刊之受人歡迎，亦正以此，……是深望新聞界注意及此。<sup>131</sup>

表1的體育類，最早一張照片是1924年〈精武體育會長梁樹棠君肖像〉，旁邊搭配其新聞。<sup>132</sup> 從1924-1949的26年裡，《申報》每年3月1-10日共登38張體育照片，平均1天僅0.15張，比例甚低；但筆者抽樣的時段正好沒遇到大型賽事，呈現平常情況。若有重要比賽，體育新聞及照片會大幅提高，如1927年第八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賽程是8月28日至9月4日8天，《申報》從8月27日就有體育照片，最後一張登在9月5日，10天裡共89張體育照片，<sup>133</sup> 平均1天8.9張，是上述平均1天0.15張的59.3倍。

每種賽事性質殊異，一位攝影記者分享經驗：賽跑要拍跑者衝向終點剎那，「快門以五百分一秒左右，攝後須速即跳出跑道」，以免與其相撞。跳遠、跳高則蹲在沙坑旁，「當其跳起之中途而攝之」（如圖14），<sup>134</sup> 攝影記者要戴帽子，以防吃到揚起的黃沙。擲鐵餅、鐵球、標槍需站遠些，「用三百分之一秒以上之

<sup>128</sup> 滬蓉航空線六號機早上七時從上海虹橋機場起飛，因杭州沒有機場，在杭州北方的笕橋機場降落，再用汽車載到會場，八時半左右開賣《時報》；〈本報飛機到場〉，《時報》，上海，1930年4月1日，版3；〈飛報萬眾歡迎〉，《時報》，上海，1930年4月2日，版3；〈飛機消息〉，《時報》，上海，1930年4月3日，版3。

<sup>129</sup> 袁義勤，〈黃伯惠與時報〉，《新聞大學》，1995年夏季號（1995年無月份），頁43。

<sup>130</sup> 〈本報昨天銷售更佳〉，《時報》，上海，1930年4月4日，版3；〈蔣主席夫婦同看時報〉，《時報》，上海，1930年4月2日，版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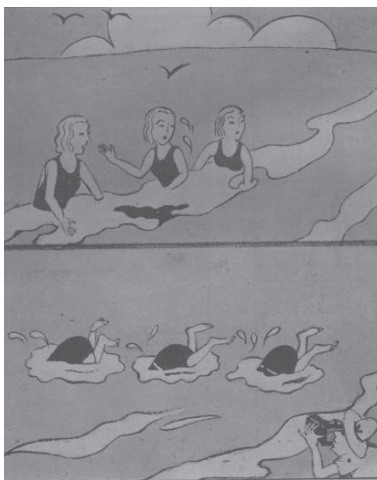
<sup>131</sup> 〈教育界名宿，蔡元培氏讚美時報革新精神〉，《時報》，上海，1930年4月12日，版3。

<sup>132</sup> 〈精武體育會長梁樹棠君肖像〉，《申報》，上海，1924年3月2日，本埠附刊版2。

<sup>133</sup> 在這89張照片裡，王開照相館55張，中國攝影學會新聞部林澤蒼12張。

<sup>134</sup> 〈世運跳高第四芬蘭選手特加斯〉，《時報》，上海，1936年8月30日，版1。

快門」，拍攝擲出後的姿勢。球類比賽冗長，幾個精彩的畫面就夠，如籃球拍投籃，排球「在網下拍一方躍起壓球」的鏡頭，網球則拍「正反手抽球的姿勢」，棒球拍「投手擊手和接手」。眾人競走要趕在賽者前面，一群走來時從「對面拍去」。大部分運動適合反光照相機，但游泳卻要用直視觀景器的小鏡箱。有些運動不是擠在近處拍攝，團體操，領獎、疊羅漢，反要用廣角鏡頭，「從高處較遠攝影」。<sup>135</sup> 嚴秉章則提供拍攝足球比賽的訣竅，球員奔跑時，要從正面對準他，「這樣他的影像適如完全停著不動」，較好聚焦；照相機不要舉太高，最好靠近地面拍攝，這樣「球員的影像可以大一些」，「顯出賽球的力量來」。<sup>136</sup> 雖有上述技巧，但體育賽事動作快速，攝影鏡頭不好捕捉（圖15），描繪泳將浮出水面時、記者的相機還沒跟上；快門按下剎那、泳將卻已沉入水中。<sup>137</sup>



14

15

圖14、世運跳高第四芬蘭選手特加斯影像圖

圖15、描繪游泳照片難以捕捉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世運跳高第四芬蘭選手特加斯〉，《時報》，上海，1936年8月30日，頁1；〈攝影記者的苦澀〉，《中國畫報》，上海，第2卷第9期（1936年5月31日），頁4。

<sup>135</sup> 穆式龍，〈新聞攝影雜談〉，《生力》，上海，1936年8月20日，頁29-30。

<sup>136</sup> 嚴秉章，〈對於足球攝影的幾句實用話〉，《中華攝影雜誌》，上海，第5期（1932年12月），頁186、188。

<sup>137</sup> 〈攝影記者的苦澀（插圖）〉，《中國畫報》，上海，第2卷第9期（1936年5月31日），頁4。

據學者游鑑明研究，運動會是公開展示的活動，記者將競賽過程、比賽結果乃至觀賽心得登載報刊，讓無法到場的讀者得知體育訊息。文字描寫外，也透過照相機拍照，把比賽的激烈實況、運動員長相、場外生活花絮等展示在讀者眼前。由於運動員也是公眾人物，觀眾對其充滿好奇，也喜歡對之品頭論足，媒體掌握社會這種心態，特別關注女運動員。<sup>138</sup> 來自東北的田徑好手孫桂雲就是例子，1930年4月1-10日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在杭州舉行，她代表東省特別區獲得50公尺、200公尺賽跑第一名，與隊友合作又奪得200公尺接力第一名，成績皆創全國紀錄。身手矯健、長相清秀的她成為媒體焦點，她參加1930年東京舉行的第九屆遠東運動會前夕，中國田徑代表隊5月10日在上海先舉辦行運動會，當天她在50公尺賽跑僅得第二，但賽後「十餘攝影者包圍孫桂雲而攝」（圖16）。<sup>139</sup> 《新聞報》顧執中批評，《時報》老闆黃伯惠為與《新聞報》、《申報》競爭，喜歡登露大腿的女運動員照片，把《時報》變成庸俗，非真正為了提倡體育。<sup>140</sup>



圖16、男性攝影記者拍攝孫桂雲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孫桂雲之背影〉，《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5卷第238期（1930年5月17日），頁6。

<sup>138</sup>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頁197、202、229。

<sup>139</sup> 〈孫桂雲之背影〉，《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5卷第238期（1930年5月17日），頁6。

<sup>140</sup> 顧執中，《報海雜憶》，頁179。

游泳穿得更少，楊秀瓊是另個自運動會竄紅的美女。1933年10月楊秀瓊代表香港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囊括五項女子游泳冠軍，由於她年輕健美，被上海《時報》記者滕樹穀冠上「美人魚」稱號，天津《大公報》徐鑄成回憶：

滕君花樣百出，其拿手傑作，為將打破大會多項全國紀錄之游泳女將楊秀瓊賜名謂「美人魚」，每日刊載大幅照片，並每日刊登楊秀瓊之「起居注」，這樣的「噱頭」一時很能迎合部分讀者的低級趣味。<sup>141</sup>

全運會後楊秀瓊成為媒體寵兒，常參加各種社交活動，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特備馬車、充當楊秀瓊車伕逛中山陵的照片在報上刊出，<sup>142</sup>炒得沸沸揚揚。因褚民誼夫人是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的義妹，據說褚民誼因這張照片遭到陳璧君「拍案大罵」。<sup>143</sup>

運動明星受民眾關注，體育照片成為報館的外快。1948年5月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申報》攝影記者在會場拍攝不少照片，「當晚帶回報館，連夜洗印」。照片除可登在報上，還能帶到會場販賣。《申報》在會場設立的辦事處大貼照片，「引得男女觀眾」，「爭先觀看」。辦事處對面的《申報》社會服務科，「特備全運像片樣本三巨冊，任憑來賓選購」，「生意奇好」。<sup>144</sup>

## 六、文藝新聞

表1的文藝類，最早一張照片是1910年〈邊壽民畫冊之三〉（圖17），<sup>145</sup>該年3月1-10日《申報》沒其他新聞照片，但每天都有張文藝照片單獨刊出，在緊要新聞版面調劑篇幅。照片標題可知是輪流連載邊壽民、王小梅的畫，兩本畫冊都是中國風，邊壽民擅長花卉，王小梅則是人物畫。從1910-1949的40年裡，《申報》每年3月1-10日共有81張文藝照片，平均1天0.2張，頻率不高。但文藝類照片出現得蠻早，比國際照片1919年、影劇照片1922年、體育照片1924年早很多。

<sup>141</sup>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33。

<sup>142</sup> 〈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為美人魚執鞭圖〉，《新天津畫報》，天津，第50期（1934年8月12日），版2。

<sup>143</sup> 陳存仁，《抗戰時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6。

<sup>144</sup> 爾礎，〈申報在全運會中的活動〉，《申報館內通訊》，第2卷第5期（1948年5月），頁6。

<sup>145</sup> 〈中國名畫邊壽民畫冊之三〉，《申報》，上海，1910年3月1日，第一張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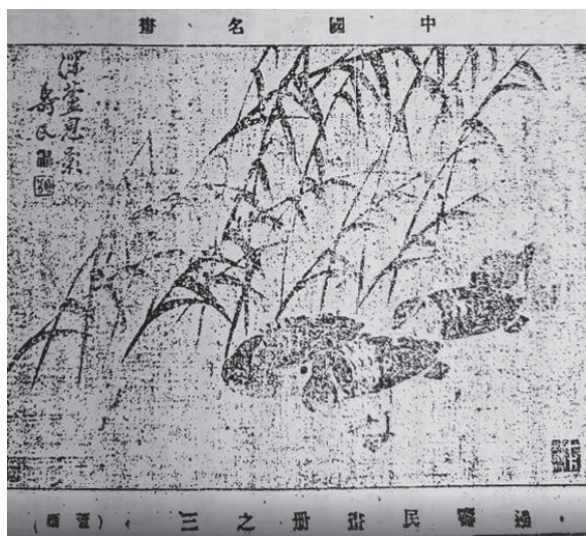


圖17、中國名畫邊壽民畫冊之三影像圖

資料來源：〈中國名畫邊壽民畫冊之三〉，《申報》，上海，1910年3月1日，第一張版4。

西洋畫的也有，如1928年為了搭配副刊的摩西故事連載，《申報》找參孫、該隱等聖經人物的畫像照，讓讀者有更生動的閱讀體驗。<sup>146</sup> 除繪畫，文藝類照片還有攝影作品，這種非新聞性的藝術照片，也被攝影愛好者投稿到《申報》。如1927年照片〈燈下〉，<sup>147</sup> 拍攝者褚保衡，北大讀書時就熱愛攝影，曾創中央寫真通信社，畢業後到中國攝影學會新聞部工作，業餘到處拍照，常發表作品。雖然對攝影愛好者來說，畫報雜誌有較好的版面與紙質，能讓作品完美呈現；但報紙的銷量較多，刊登照片能廣為人知，還是吸引一些投稿者。如1937年3月4日《申報》「圖畫特刊」第四版做整版「美的攝影」專題，刊登9張投稿作品，每人姓名都標在作品下方。<sup>148</sup>

<sup>146</sup> 〈找參孫〉，《申報》，上海，1928年3月3日，本埠增刊版6；〈該隱〉，《申報》，上海，1928年3月4日，本埠增刊版6。

<sup>147</sup> 〈燈下〉，《申報》，上海，1927年3月1日，本埠增刊版4。

<sup>148</sup> 〈圖畫特刊〉，《申報》，上海，1937年3月4日，圖畫特刊版4。

另外還有些藝術實物的照片，內容包羅萬象，多數沒搭配新聞，僅以照片加標題簡單呈現，如1927年的西洋雕塑作品、1937年中國古文物照片、1947年福州漆器照片，<sup>149</sup> 登在本埠增刊或文藝副刊裡，增添藝術氣息。部分照片有搭配新聞，如1937年兩張梅花盆栽照片，旁有文章介紹種植與修剪訣竅。<sup>150</sup>

有時會依據副刊的內容，搭配文藝人物的照片。如1937年「文藝專刊」刊登文章〈幼年的普希金〉，就搭配一張個人照，讓讀者瞭解這位俄國詩人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的生平與長相。1947年刊登豐子愷的繪畫照片時，另有他與京劇演員梅蘭芳的合照，<sup>151</sup> 展現這位畫家的社交生活。

少數文藝照片具時效性，如1931年3月8日，《申報》報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生將在3月22日舉辦展覽，旁邊刊出參展作品的照片，為美術展覽做宣傳。另外還有文藝活動的新聞報導，如1941年刊登近期小學生繪畫比賽得獎作品照片，給優勝者姓名與作品同時見報的榮譽。<sup>152</sup>

本文僅就報紙的新聞照片分類量化，其實早在照片出現之前，報紙一直有許多插圖漫畫，尤其在文藝副刊裡。插圖漫畫的製作方式，早期使用木雕、鏤版或石印，後來還有鋅版，這些插圖漫畫與文藝照片一樣，讓報紙的版面更生動活潑。<sup>153</sup>

<sup>149</sup> 〈文物照片〉，《申報》，上海，1927、1937、1947年3月1、3、5日，本埠增刊版6、版18、8。

<sup>150</sup> 〈梅花盆栽〉，《申報》，上海，1937年3月8日，版15。

<sup>151</sup> 〈幼年的普希金〉，《申報》，上海，1937年3月5日，版16；〈豐子愷與京劇演員梅蘭芳的合照〉，《申報》，上海，1947年3月2日，版9。

<sup>152</sup> 〈繪畫比賽得獎作品〉，《申報》，上海，1931年3月8、9日，圖畫週刊版4；〈繪畫比賽得獎作品〉，《申報》，上海，1941年3月8、9日，版13。

<sup>153</sup> 因篇幅不夠大的新聞圖片或廣告，插圖漫畫的呈現效果較照片佳，也更能加入作者的主觀重點，故報刊的插圖漫畫一直占據重要地位，沒被照片取代。學界對報刊漫畫的研究，如張世瑛，〈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1928-1931）〉，《國史館館刊》，第44期（2015年6月），頁47-90。

## 七、風景照片

表1的風景類，最早一張照片是1908年〈宮景之七〉，與旁邊的新聞無關，單獨一張照片刊出。<sup>154</sup> 從1908-1949的42年裡，《申報》每年3月1-10日共有83張風景照片，平均1天0.2張，頻率不高；但風景照片出現得很早，比文藝照片的1910年還要早。《申報》風景照片按出處分三階段，清末來自風景照片集、1930年代來自各地投稿者、戰後來自本報各地記者；數量上來講，清末是偶一為之，1930年代則逐漸流行，戰後是報館有意提倡。

1908年〈宮景之七〉是北京紫禁城的照片（圖18），沒署名拍攝者，可能來自《申報》取得的宮景照片集，雖是連載，但非固定時間，下一張〈宮景之八〉在3月16日刊出。登的版面也不定，〈宮景之七〉在《申報》第一張第三版，〈宮景之八〉在第一張第二版，可見作補白用途。《申報》之後的風景照沉寂許久，11年後的1919年3月1-10日，才又出現〈古蹟圖二十一〉到〈古蹟圖二十六〉的風景照，<sup>155</sup> 10天中有6張風景照，登在副刊「自由談」上。可知早期《申報》的風景照非常態刊出，當報館得到風景照片集、編輯認為需要才點綴使用。



圖18、《申報》刊登風景照片〈宮景之七〉影像圖

資料來源：〈宮景之七〉，《申報》，上海，1908年3月5日，第一張版3。

<sup>154</sup> 〈宮景之七〉，《申報》，上海，1908年3月5日，第一張版3。

<sup>155</sup> 〈古蹟圖二十一〉，《申報》，上海，1919年3月5日，版14；〈古蹟圖二十六〉，《申報》，上海，1919年3月10日，版10。



之後，遲至1931年3月1-10日，《申報》才又刊登風景照，此時風景照片已非早年的「補白」、「點綴」，而是經常性刊出；內容不再來自一本風景照片集，而是中國各地的風景照，每張照片都署名拍攝者，可見是投稿作品。1930年《申報》開闢「圖畫週刊」後照片需求大增，廣向讀者徵求，出現拍攝中國各地風光的投稿，如1931年〈杭州大學大雪後校景〉、1935年〈青島山東大學全景〉等。<sup>156</sup> 1936年3月5日《申報》「圖畫特刊」第一版做「綏遠時事」專題，7張照片署名不同拍攝者，白塔、馬群、擠羊奶、手工地毯等一一入鏡；當天「圖畫特刊」第二版做「西京建設」專題，4張照片包括城市鳥瞰、小學興建、市區道路等，展現西安市容的進步。<sup>157</sup> 此與當時的「西北熱」有關，日本入侵華北後，西北的旅行書寫流行於知識分子間，藉以主張中國對西北的主權正當性。《申報》也出現報館記者的旅遊通信，到中國各地採訪拍照，如1936年記者趙君豪到南方採訪，發表〈漢粵紀行〉連載，3月8日刊出〈淶河大橋〉照片一張；<sup>158</sup> 1937年記者錢華到內蒙古採訪，發表〈到百齡廟去〉連載，<sup>159</sup> 搭配當地照片，展現邊疆風光。

戰後《申報》重視中國各地的照片，1946年《通信員服務則例》規定通訊員要「攝寄應時新聞照片」，收集「名人傳略及照片」。<sup>160</sup> 1947年副總編輯王啟煦催促各地記者多提供照片：

照片是使版面活潑美觀的主要構成體，而且最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所以甚盼各地同人除新聞外，能兼顧到照片的搜寄。有照相機者，請多多供給新聞照片。無照相機者，可向就地同業攝影記者或能攝影者設法洽購。<sup>161</sup>

這些照片都會標註拍攝者，如1947年「本報特派員韓清濤」為〈東北韓僑百態〉新聞，寄上兩張松花江的戶外市景照；同版還有「本報合肥記者」為〈黃泛區完

<sup>156</sup> 〈杭州大學大雪後校景〉，《申報》，上海，1931年3月1日，圖畫週刊版4；〈青島山東大學全景〉，《申報》，上海，1935年3月7日，圖畫特刊版2。

<sup>157</sup> 〈西京建設〉，《申報》，上海，1936年3月5日，圖畫特刊版1、2。

<sup>158</sup> 〈淶河大橋〉，《申報》，上海，1936年3月8日，版9。

<sup>159</sup> 〈到百齡廟去〉，《申報》，上海，1937年3月7日，申報週刊版4。

<sup>160</sup> 「通信員服務則例」（1946年1月），〈申報新聞報晨報的一些章則簡約〉，《申報新聞報檔案》，檔號：Q430：1-74。

<sup>161</sup> 王啟煦，〈版面與內容的檢討〉，《申報館內通訊》，第1卷第8期（1947年8月），頁4。

成三計畫〉新聞，搭配〈合肥包公祠雪景〉照片。<sup>162</sup> 戰後臺灣回歸中國，《申報》開始有臺灣的報導與照片，如1947年3月5日「本報駐台記者楊育」報導〈看臺灣林業〉時，佐以〈阿里山風光〉等4張照片，<sup>163</sup> 幫助讀者認識臺灣。

## 肆、新聞照片的技術問題

### 一、照相製版

利用照相複製和化學腐蝕相結合的技術製取金屬印刷版，搭配鉛字一起印刷，報刊上就能有字又有照片，達到圖文並茂的效果。1822年法國涅普斯首先進行實驗，1850年法國吉洛發明銅鋅版的照相製版法，出版界開始應用。銅鋅版工序如下：

- （一）照片倒置大鏡箱前，以弧光燈放光，照片的影射入鏡箱，映於後部的底片上〔按：底片是塗有感光液的玻璃片〕。底片前加一網版，光透過網版到達底片，故照片圖形被分成細格形。有加網版的叫銅版，能表現濃淡；不加網版叫鋅版，只呈現線條；這就是報刊上的圖照，為何有些只有黑白分明的線條，有些會有類似布紋的底、從紋格的疏密分出濃淡來。鋅版用於表格、字跡或簡圖，銅版用於照片。網版分很多種，印報紙60至80線，雜誌普通的100線、銅版紙精印的120-150線，紙越細網版越密，呈現的顆粒較精緻。
- （二）底片經顯影、定影、晾乾，另拿鋅片或銅片塗上魚膠，再把底片放在銅鋅片上一起曝光15分鐘，讓底片上的圖轉映到銅鋅片。後用水沖洗銅鋅片，底片上白的地方〔按：即照片有圖案的部分〕，光能透進去、膠質變硬、水沖洗不掉，在銅鋅片形成耐酸鹼性的琺瑯質膠膜。

<sup>162</sup> 〈合肥包公祠雪景〉，《申報》，上海，1947年3月3日，版7。

<sup>163</sup> 〈阿里山風光〉，《申報》，上海，1947年3月5日，版5、8。

- (三) 銅鋅片放到硝酸液中搖盪，膠質被水洗去的地方〔按：即照片中沒有圖案的部分〕，會被藥水腐蝕而低下去，形成凸出圖像的印刷版。
- (四) 腐蝕不均勻的地方再人工修整，之後將旁邊不要的銅鋅片鋸去〔按：可順便做美編，這可解釋有些報上的照片不是方形，而有各種形狀如（圖19），<sup>164</sup> 或將銅鋅版挖去部分另排鉛字，叫做「挖版」〕，最後將銅鋅片釘上木板，成為可與鉛字拼排印刷的銅鋅版。<sup>165</sup> 銅鋅版與鉛字的高低落差要「襯高空鉛鋼底板」，「手續非常費時麻煩」。<sup>166</sup> 據《新聞報》檔案，1930年代該報製版科有8名工人，<sup>167</sup> 從一張照片到釘成銅版，需費2.5小時。<sup>168</sup>



圖19、裁鋸照片銅版搭配插圖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過房爺姦殺過房媛〉，《東方日報》，上海，1945年5月12日，版1。

<sup>164</sup> 〈過房爺姦殺過房媛〉，《東方日報》，上海，1945年5月12日，版1。

<sup>165</sup> 耀五，〈照相製版術的過程〉，《科學知識》，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6日），頁3-9。

<sup>166</sup> 「特陳紙版組添用學徒祈核事由」（1939年7月20日），〈申報館關於員工錄用補缺及個別人員履歷〉，《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430-1-41。

<sup>167</sup> 製版科是印刷部其下一科，製版科又分銅鋅、賽銀、銅牌、木工四股，參見〈組織〉，《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年），頁7；「新聞報館工友館使役工資單，1937年8月上半月」、「職工薪給平均每月所得表」（1939年12月），〈新聞報館幾個時期職工工資單〉，《申報新聞報檔案》，檔號：Q430-1-265。

<sup>168</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33。

較大的報館如上海前三大日報《新聞報》、《申報》、《時報》，<sup>169</sup> 都陸續招聘技師購置機器，成立自己的照相製版部，讓照片迅速見報。《時報》老闆黃伯惠曾遊歷歐美考察印刷工藝，「向德國購置套色輪轉機」，「常廁身機器房內，研究試驗」。《時報》對照相製版非常講究，製版前先用噴筆修照，網線亦視照片而有差別，製版部主持人唐鏡元為攝影名家，並自營製版廠，經驗豐富。<sup>170</sup>

因應《時報》吹起的新聞照片風潮，銷量全國第一的《新聞報》1920年成立該報製版部（圖20），<sup>171</sup> 備有最新德國Klimsch銅鋅版機（圖21），<sup>172</sup> 「數小時即可將銅鋅版製成」。<sup>173</sup> 《新聞報》深具生意頭腦，機器買了就盡量使用，報上同步刊登廣告，「各種代印品應有盡有」，<sup>174</sup> 「能於極短時間，製成極精美之鋅版銅版」。<sup>175</sup> 製版科又設銅牌股，代客鑄製銅招牌，是上海報界首創的副業，<sup>176</sup> 強調「本館製造銅招牌機器，係外洋第一部運到」。<sup>177</sup> 不過《新聞報》早期的照片不多，1920年抽樣的3月1-10日只有4張照片，比起《申報》12張、《時報》22張遜色，遭《申報》戈公振批評：

近來各報館銅版部，有以代製銅版鋅版為業者，其收入亦頗豐，借以減輕銅版部之支出。惟本報上之圖畫反不多見，捨本逐末，則未免有失設部之意耳。<sup>178</sup>

<sup>169</sup> 《時報》負責照相製版的周吉君，從日本照相技師小林榮居習得技術，曾在中華書局、有正書局任照相製版員。參見滄春，〈介紹照相製版技師〉，《大世界》，上海，1918年5月13日，版2。

<sup>170</sup> 邵翼之，〈我所知道的上海時報〉，《報學》，第8期（1955年12月），頁76-78。

<sup>171</sup> 〈本館製版部〉，《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冊》（上海：新聞報館，1923年），無頁碼。

<sup>172</sup> 〈克理姆虛製版攝影機〉，《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年），頁7。

<sup>173</sup> 〈設備〉，《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年），頁7。

<sup>174</sup> 〈本館添設照像製版部啟事〉，《新聞報》，上海，1920年3月6日，第三張版2。

<sup>175</sup> 〈鋅版銅版〉，《新聞報》，上海，1924年3月3日，第二張版2。

<sup>176</sup> 汪仲章，〈新聞報發展過程拾零〉，《新聞研究資料》，總第23輯（1984年1月），頁196。

<sup>177</sup> 〈銅招牌燦爛生光〉，《新聞報》，上海，1924年3月8日，第三張版1。

<sup>178</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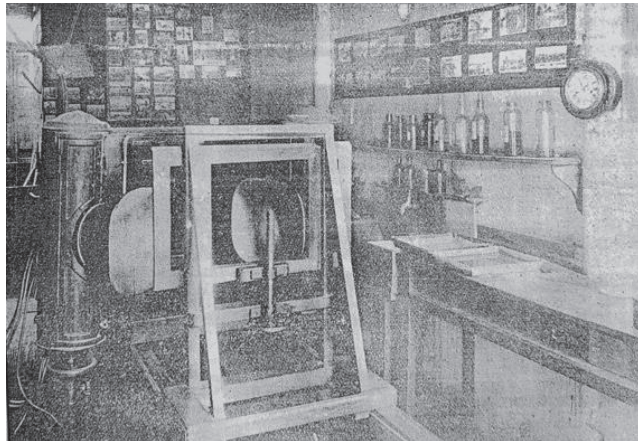


圖20、照相製版部影像圖

資料來源：〈本館製版部〉，《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冊》（上海：新聞報館，1923年），無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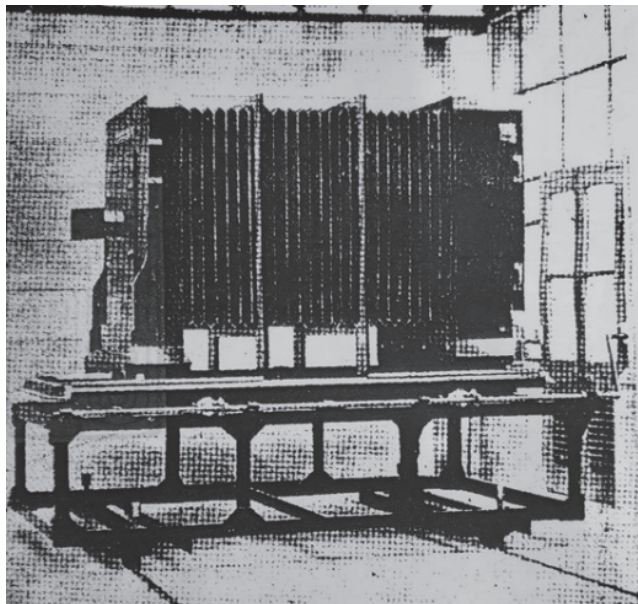


圖21、德國Klimsch銅鋅版機影像圖

資料來源：〈克理姆虛製版攝影機〉，《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年），頁7。



較小的報館沒製版設備，拿照片委外製版，有的託其他報館，如《時事新報》、《大晚報》託《大陸報》製作銅鋅版；<sup>179</sup> 有的交製版公司負責，<sup>180</sup> 如小報《金鋼鑽》、《新春秋》委託「華新製版公司」，<sup>181</sup>《捲筒紙畫報》委託「秀英舍照相製版部」。<sup>182</sup> 上海1926年已有20多家照相製版公司，原本削價競爭，後籌組同業公會劃一價格。<sup>183</sup> 照相製版公司的每個步驟分別計費，1939年銅鋅版每方寸1角2分，加網線、鋸銅版，每方寸都再加2分，銅鋅版最少要做6方寸（如2吋長3吋寬），報界為省錢常把幾張小照拼在一起製版，再付鋸版費分開；上海照相製版同業公會為維護權益，8月起規定「一律以6方寸起算，不得拼算」，使報館使用照片的成本增加。<sup>184</sup> 上海照相製版業在抗戰前發展到高峰，每月可製200萬英吋的銅鋅版，報館委託量占25%，其他是印刷所25%，書局50%。抗戰結束後出版業萎縮，上海照相製版業公司1947年有33家，職工共371人，每月產量100萬英吋的銅鋅版，只有戰前一半。中國照相製版所需的器材與銅鋅原料仰賴國外進口，在結匯困難的戰後格外辛苦。<sup>185</sup>

上述的銅版是凸版印刷，對畫面的光暗濃淡，以網點大小來表現，但印墨膜的厚薄一律，畫面不夠有深度。影寫版〔按：又名照相凹版〕即是改革，其對畫面的光暗濃淡，以墨膜的厚薄來表現，就會有立體感。工序如下：（一）在碳素紙上塗明膠，浸入重鉻酸鉀溶液，使膠層具感光性，涼乾後與網屏密合曝光，形成感光硬化的網點。（二）碳素紙與底片密合曝光，因底片上的陰暗透光強弱不同，曝光後網點上明膠層的感光硬化程度也不同。（三）將碳素紙膠貼在銅滾筒

<sup>179</sup> 前《申報》經理張竹平1928年購得《時事新報》股權，後接辦上海英文日報《大陸報》，1932年創《大晚報》，幾家媒體彼此合作。

<sup>180</sup> 上海的印刷公司有的兼營銅鋅版，報人包天笑的姪子在猶太人開的雕刻印刷所工作，「擬攬做《上海畫報》及《晶報》之鋅銅版」，拜託包天笑幫忙引介。參見包天笑，《鈞影樓日記》，1925年2月15日條，上海圖書館藏，感謝孫慧敏提供。

<sup>181</sup> 〈本報所製銅鋅版〉，《新春秋》，上海，1928年10月21日，版2。

<sup>182</sup> 〈最精美之銅鋅版〉，《捲筒紙畫報》，上海，第171期（1928年12月29日），頁5。

<sup>183</sup> 〈照相製版業將組織公會〉，《新聞報》，上海，1926年11月22日，版14。

<sup>184</sup> 千，〈做銅鋅版時的常識〉，《正報》，上海，1939年5月12日，版6；〈滬照相製版業聯合漲價〉，《藝文印刷月刊》，上海，1939年8月1日，頁28。

<sup>185</sup> 〈本市照相製版工業概況〉，《中華國貨產銷協會每周匯報》，上海，第4卷第25期（1947年5月21日），頁2-3。

上，水中揭下紙基，沒感光的明膠被水溶解除去，感光硬化的網點則不被水溶解而保留下來。（四）銅滾筒表面上附著一層硬化程度不同的明膠層，用三氯化鐵溶液腐蝕，形成一個個腐蝕深淺不同的網坑。<sup>186</sup>

影寫版工序繁複，但1小時可印3萬份，一般用在對品質較要求的雜誌或書籍，如上海《良友畫報》。<sup>187</sup>《申報》1930年5月18日起出版「圖畫週刊」，為與《時報》10年歷史的「圖畫時報」相抗，《申報》捨棄自家的銅鋅部門，委外製作影寫版。「當時上海有照相版設備的印刷所只有一家」，《申報》與之訂合同，不能幫別報印。眼見第二大報《申報》增出攝影附刊，第一大報《新聞報》趕在《申報》的兩週前——5月4日起出版「圖畫附刊」。但能印影寫版的印刷所受合約限制不能再幫《新聞報》，只好「託一家有橡皮版的印刷所代印」。<sup>188</sup>橡皮版是平版印刷，先把上墨的圖像移到橡皮布上、再轉印到紙上，能彌補承印物表面的不平整，油墨充分轉移印刷效果細膩。由上看來，《新聞報》、《申報》不只在出版攝影附刊上競爭，製版印刷也不惜投資。

## 二、紙質與版面問題

新聞照片在近代中國報界的發展，甚受紙質的侷限。照片印在相紙上效果最好，雜誌其次，報紙最差。報紙用一般新聞紙印刷，報館稱為「白報紙」，強度足以承受高速印刷，但紙質粗糙價錢便宜，符合報紙追求銷量、靠廣告賺錢的低價策略。雜誌出版密度不如報紙，紙張用量較少，多以道林紙精印成冊，紙張較細之故，照片的印刷效果比報紙好。1909年《時報》刊印「各學堂所寄照相」時，承認「日報紙墨均粗，故印出時與原片頗殊，異日另印成冊時，當用精良紙墨印出時，殆可與照片無甚差異」。<sup>189</sup>

<sup>186</sup> 楊暉，《照相製版與平版印刷的原理和實用》，上冊（臺北，1965年增訂版），頁95、97。

<sup>187</sup> 《良友畫報》原自己印刷，第45期起為了影寫版，委託商務印書館承印。參見馬國亮，《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頁71。

<sup>188</sup> 汪仲章，〈又競爭又聯合的新、申兩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5輯（1982年8月），頁83-84。

<sup>189</sup> 〈上海崇實學堂學生操隊〉，《時報》，上海，1909年3月8日，版11。

兩者若要比較，筆者以《捲筒紙畫報》及《中國攝影學會畫報》來說明。《攝影畫報》是林澤蒼1925年8月至1937年8月出版的一份週刊，刊名、開本幾經變動，以《攝影畫報》名義刊行最久。愛好攝影的林澤蒼1925年在上海發起中國攝影學會，故該刊有段時間叫做《中國攝影學會畫報》；1928年1月28日至1930年2月15日同時另出《捲筒紙畫報》，內容、期數與正在發行的《中國攝影學會畫報》一樣。<sup>190</sup> 為何同時出版兩刊？以第171期封面為例，可看出《捲筒紙畫報》的印刷效果（圖22）不如《中國攝影學會畫報》（圖23）。<sup>191</sup> 小報《福爾摩斯》回憶：

每逢週六，市上有一種《捲筒紙畫報》，實即《攝影畫報》之變相，惟《攝影畫報》，以桃令紙印，每張售六分，而《捲筒紙畫報》，祇須四十文耳。<sup>192</sup>

桃令紙即道林紙，是較高級的書刊印刷紙，最初由美國道林（Dowling）公司製造進口，後成高級印刷用紙的泛稱。《中國攝影學會畫報》自稱「用本報特定之黃銅紙精印」，<sup>193</sup>「不惜工本向外洋訂購」，「每令需25元」，<sup>194</sup>據上述照相製版的說法，銅版紙搭配120-150線的網版，<sup>195</sup>紙細網密，照片的呈現非常精緻。《中國攝影學會畫報》成本高昂曲高和寡，才想同步發行廉價的《捲筒紙畫報》，兼顧各種客群。<sup>196</sup>但《捲筒紙畫報》無法滿足畫報讀者的品質要求，「精細之銅圖不合『報紙』之印刷」，「減美觀」；且「用報紙印而售價極廉」，「本報按期虧本」，沒達到初設的「廣告效果」，故決定將《捲筒紙畫報》停刊。<sup>197</sup>

<sup>190</sup>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畫報源流特點探究》（臺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2年），頁121-127。祝均宙將畫報依印刷進展分期，為石印（1874-1920年）、銅鋅版（1925-1930年）、影寫凹版（1930-1949年）。

<sup>191</sup> 《捲筒紙畫報》、《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171期（1928年12月29日），頁1。

<sup>192</sup> 農，《福爾摩斯》，上海，1931年9月20日，版2。

<sup>193</sup> 〈用本報特定之黃銅紙精印〉，《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237期（1930年5月10日），頁6。

<sup>194</sup> 〈讀者福音〉，《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4卷第164期（1928年11月10日），頁6。

<sup>195</sup> 耀五，〈照相製版術的過程〉，《科學知識》，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6日），頁5。

<sup>196</sup> 戈公振回國後與林澤蒼分享外國畫報，依紙質分成兩種，銅版紙道林紙的印刷精故貴，報紙印得畫報便宜適合在中國推廣。參見記者，〈戈公振對於畫報之見解〉，《捲筒紙畫報》，第4卷第171期（1928年12月29日），頁2。

<sup>197</sup> 〈捲筒紙畫報停止發行啟事〉，《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229期（1930年3月15日），頁8。



圖22、白報紙印刷的《捲筒紙畫報》影像圖

資料來源：《捲筒紙畫報》，上海，第171期（1928年12月29日），頁1。



圖23、銅版紙印刷的《中國攝影學會畫報》影像圖

資料來源：《中國攝影學會畫報》，上海，第171期（1928年12月29日），頁1。

報紙天天出版，照相製版工序費時，趕不上截稿只好捨棄。<sup>198</sup> 報紙版面有限，先排廣告，再放新聞、評論、副刊等，占面積的照片常被擱置，上海《大公報》攝影記者魏守忠回憶：

<sup>198</sup> 如上海《聞聲》的〈編後〉說明：「本刊這一期因為畫報銅鋅版製得太遲」，「脫期了三個星期」，第4卷第7期（1936年1月15日），頁91。

儘管我們每天向夜班編輯提供當天拍攝的新聞照片，但限於版面和製版印刷條件，刊用的仍很少，經常製好了銅版臨時被文字稿擠下來。<sup>199</sup>

有些編輯「佞惜地位，甚於金錢，核定尺寸，異常渺小」，照片印入報紙，「模糊一片，讀者未覺其有趣」。<sup>200</sup> 雜誌刊期長時間充裕，頁數多版面從容，加上紙質印刷精良，照片可印得很大，呈現的效果較好。當時讀者看報紙主要為了即時資訊，此足以解釋電報多照片少的《新聞報》仍能穩居銷量冠軍。喜歡時事照片的讀者，可再買雜誌來看，畫報就是圖照為主、文字為輔的刊物。民初僅上海一地即有許多畫報，重要的出版時間、刊期、創辦人如下：《真相畫報》（1912.6-1913.3，旬刊，高奇峰）、《世界畫報》（1918.8-1927.10，週刊，孫雪泥）、《上海畫報》（1925.6-1933.2，初為三日刊、後改五日刊，畢倚虹）、《攝影畫報》（1925.8-1937.8，週刊，林澤蒼）、《良友畫報》（1926.2-1945.10，月刊，伍聯德）等。<sup>201</sup>

從此角度看，報紙的攝影附刊是兼顧報紙、雜誌兩種紙質的嘗試。<sup>202</sup> 1920年6月起上海《時報》出版「圖畫時報」，用銅版紙單獨精印，週日隨報附送，深受讀者歡迎，後改成每週兩次。<sup>203</sup> 但報紙售價遠低於雜誌，銅版紙、照相製版

<sup>199</sup> 魏守忠、管紹熙，〈上海大公報的攝影工作〉，收入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234。

<sup>200</sup> 趙君豪，《中國近代之報業》，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6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頁31。

<sup>201</sup> 據陳學聖研究，1930年代上海攝影雜誌種類多樣，一是通俗綜合性時事畫報，如《良友畫報》及《時代畫報》（1929-1937），發行量高，推動大眾對攝影的興趣；二是業餘攝影愛好者辦的雜誌，如《天鵬》（1927-1929）、《中華攝影雜誌》（1931-1936），聯繫攝影同好提升專業知識，然受限人力經費訂戶，不易長久維持；三是攝影器材商發行的雜誌，如《柯達雜誌》（1930-1937）、《飛鷹》（1936-1937），因有商業贊助雜誌印刷精良，深受攝影愛好者喜愛。見陳學聖，《尋回失落的民國攝影》（臺北：富凱藝術有限公司，2015年），頁159-208。

<sup>202</sup> 「圖畫週刊」創刊後《申報》照片數量增加，表1可得驗證。1930年統計時（3月1-10日）41張照片，當年5月18日「圖畫週刊」出版，1931年的統計就增至90張，1932年一二八事變「圖畫週刊」停刊僅4張，1933年27張，1934年「圖畫週刊」復刊50張，1936年79張，1937年50張，抗戰爆發後「圖畫週刊」停刊，1938年《申報》遷漢口版面大減沒任何照片。

<sup>203</sup> 1928年5月2日起改每週兩次，因「銷數激增」，印刷「速率有限」，「較晚照片不能刊入」，故將「畫報分做兩期付印」；〈時報館發行部啟事〉，《時報》，上海，1928年4月22日，版1。



成本高昂，《時報》負荷沉重，1925年3月起改成「洋紙」〔按：即白報紙〕印刷，<sup>204</sup> 1931年3月起改回每週一次。<sup>205</sup>

### 三、相機、底片與鎂光燈

照相機當時稱「鏡箱」，早期中國攝影記者多使用反光鏡箱，機身笨重，體積大到「能提供記者於疲勞時權充小凳」，<sup>206</sup> 往來奔跑不甚靈活。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四屆六中全會，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會後團體拍照時，遭孫鳳鳴開槍射傷。孫鳳鳴託名晨光通訊社記者，混入攝影記者中，以照相機掩護手槍對汪精衛射擊，<sup>207</sup> 可見這種相機之龐大。刺汪案後攝影記者地位下降，「被一班官僚目為劊子手，工作方面，大感棘手」。龐大機器對政治人物深具威脅感，攝影記者常被門口守衛攔下，要求打開機器檢查。<sup>208</sup>

《時報》金雄白回憶，反光鏡箱除了本身笨重，還得帶10張玻璃底片，放在木匣中防止走光。相機無對光聚焦設備，全憑拍照者經驗，快門只有十分之一秒，很難抓到清晰畫面。<sup>209</sup> 不過也有人喜歡反光鏡箱，《大公報》孔昭愷認為非常適合他的近視眼，「方匣子，砂玻璃，對光容易，只要砂玻璃上顯像清楚，一按快門就行了」。<sup>210</sup> 不過反光鏡箱有視線上的限制，使用時需把鏡箱放在胸前（圖24），<sup>211</sup> 才能探查景物在片上的位置，而鏡頭的水平線，「受觀影黑套之限制」，「祇能及於胸口」，想拍「窗口短牆及輪船上飛機上等處」，「難能再把

<sup>204</sup> 〈本畫報自今日起完全改用洋紙精印〉，《時報》，上海，1925年3月1日，圖畫時報第五張版1。

<sup>205</sup> 〈本報啟事〉，《時報》，上海，1931年3月1日，版2。

<sup>206</sup> 穆式龍，〈新聞攝影雜談〉，《生力》，創刊號（1936年8月20日），頁28。

<sup>207</sup> 〈六中全會開幕禮成，汪院長遭暴徒狙擊〉，《申報》，上海，1935年11月2日，版3；孔昭愷，《舊大公報坐科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60。

<sup>208</sup> 毛松友，〈新聞攝影概論〉，《黑白影集》，上海，第3期（1936年），頁81；《社會日報》，上海，1935年10月13日，版1。

<sup>209</sup> 金雄白，《記者生涯五十年》，上集，頁117。

<sup>210</sup> 孔昭愷，《舊大公報坐科記》，頁33。

<sup>211</sup> 〈照相家郎靜山嫁女時為新伉儷攝影〉，《時報》，上海，1929年9月22日，版4。

鏡線移高」。<sup>2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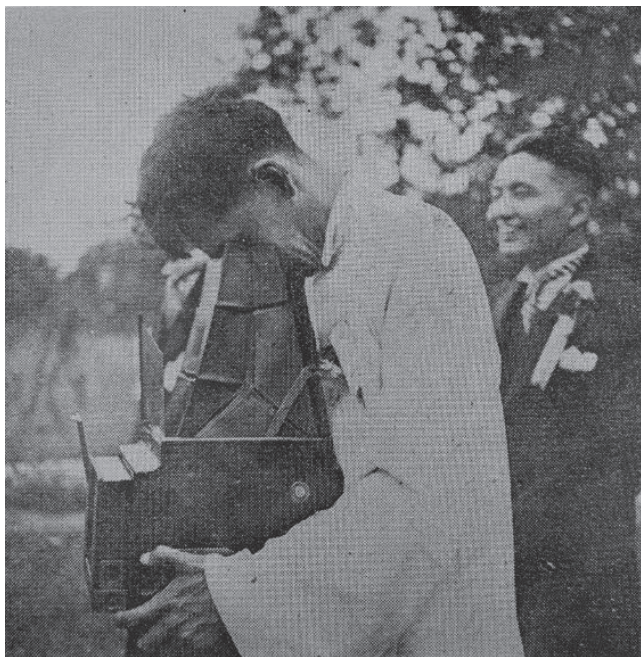


圖24、郎靜山使用反光鏡箱拍照影像圖

資料來源：〈照相家郎靜山嫁女時為新伉儷攝影〉，《時報》，上海，1929年9月22日（圖畫時報第597號），版4。

後來美國柯達公司創辦人伊士曼發明乾式軟片〔按：又名捲片、膠卷〕，在薄片上塗鹵化銀晶體的明膠乳劑，專用軟片的相機亦問世，「攝影術遂成大眾化娛樂品」。<sup>213</sup>「捲片小鏡箱」優點是「箱身堅固小巧」，還可將「鏡身顛倒」拍攝，也可用於飛機上的攝影。但最初新聞攝影界對軟片與小鏡箱有段接受期，認為有3個缺點：（一）底片問題：一捲12張，「一捲未完，不得沖洗」，如遇一

<sup>212</sup> 穆式龍，〈新聞攝影雜談〉，《生力》，創刊號（1936年8月20日），頁28；非非，〈從飛機上照相〉，《攝影畫報》，第10卷第34期（1934年11月17日），頁26。

<sup>213</sup> 聶光地，〈攝影百年進步概談〉，《良友畫報》，第150期（1940年1月），無頁碼。

張極好材料的照片，就要不惜一捲軟片的代價去沖洗。<sup>214</sup>（二）速度問題：「鏡箱越佳，則手續越較複雜」，拍攝移動人物時「每失於過慢」。<sup>215</sup> 拍攝者要養成拍好捲到下一張底片的習慣，突遇題材才可立刻攝影。<sup>216</sup>（三）噪音問題：快門「不免有過響之弊」，不方便偷拍外，<sup>217</sup> 也常被視為擾亂會場，一位攝影記者回憶曾因此被刁難，「恐怕我那輕巧的攝影聲打斷了那無上至尊港督的訓話」。<sup>218</sup>

中國所用的照相器材，除專供照相館所用的木製座機及需求很少的環型照相機有少量國產外，<sup>219</sup> 其餘的器具或材料，從照相機、底片、感光紙、<sup>220</sup> 沖洗藥品等全賴進口，據統計1931年全國進口照相器材總值3,840,249兩，1932年3,246,003兩，<sup>221</sup> 其中從美國進口最多，德國其次，日本第三。12張一捲的柯達軟片，1925年售8角，1931年售2元4角5分，暴增3倍。<sup>222</sup> 抗戰期間物資缺乏，售價節節上升，「徠卡30元1捲」，「沖洗一捲2元，放大三吋一張2元」。<sup>223</sup> 戰後外匯動盪進口稀少，攝影器材連番上漲，1947年原售3,000元一捲的軟片，漲成7,500元。<sup>224</sup>

白天或光線夠的場合可用相機直接攝影，天候不佳或是晚上就需閃光燈的幫忙。早期的閃光燈使用鎂粉作為發光材料，鎂在通電後與空氣中的氧氣發生反

<sup>214</sup> 穆式龍，〈新聞攝影雜談〉，《生力》，創刊號（1936年8月20日），頁28-29。

<sup>215</sup> 劉旭滄，〈吾怎樣開始學習攝影〉，《良友畫報》，第150期（1940年1月），無頁碼；〈新聞照相〉，《攝影學月報》，第8期（1927年7月），頁8。

<sup>216</sup> 張廷芳，〈攝影者應養成的習慣一種〉，《中華攝影雜誌》，第4期（1932年10月），頁143。

<sup>217</sup> 〈小鏡箱與新聞攝影〉，《攝影畫報》，第13卷第5期（1937年1月），頁176-177。

<sup>218</sup> 羅士興，〈一位攝影記者的自白〉，《攝影畫報》，第11卷第34期（1935年10月），頁8。

<sup>219</sup> 朱壽仁認為中國自製照相器材能與舶來品抗衡的，只有錢景華之環象攝影機、陳筱舫之相紙、老焱若之攝影用品，參見朱壽仁，〈編輯者言〉，《中華攝影雜誌》，第1期（1931年10月），頁10。

<sup>220</sup> 1935年1至7月僅底片與相紙就進口201萬9,464元，參見〈照片材料進口激增〉，《攝影畫報》，第11卷第31期（1935年9月），頁1044。

<sup>221</sup> 仁，〈攝影材料進口總值〉，《中華攝影雜誌》，第6期（1933年4月），頁247。

<sup>222</sup> 高維祥，〈全國攝影材料輸入統計〉，《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7卷第312期（1931年10月），頁96。

<sup>223</sup> 狄晞，〈怎樣做一個攝影記者〉，《戰時新聞》，第3卷第2、3、4期合刊（1940年10、11、12月合刊），頁13。

<sup>224</sup> 〈攝影材料適時上漲〉，《立報》，上海，1947年2月7日，版5。

應，產生的強光能照亮被攝體。這種鎂光燈「不似現在簡便，要將鎂粉灑在機上，打開火石機紐，轟然一響，遽發強光，煙霧卻瀰漫全室」，<sup>225</sup> 常會驚嚇他人，一位攝影記者回憶：

倘在人群眾多的地方，事前必須通知主持人，以免滋生誤會擾亂秩序。記得那年杭州靈隱寺舉行的「時輪金剛法會」，滬某報記者在班禪法師左近，驟地轟然一聲，終以人心大亂而嘗了幾小時的鐵窗風味。<sup>226</sup>

後來進展成鎂光燈泡，將鎂和鋁纏繞的燈絲放置在充了氧氣的燈泡中。強光對人是種干擾，有些場合不准使用，如1948年南京國民大會開幕式，「對於攝影限制非常嚴格」，「不能使用鎂光燈泡」，「不能任意利用角度」，「祇能在記者席上遠度攝取」，令攝影記者困擾不已。<sup>227</sup> 且鎂光燈泡是一次性的，用完需更換燈泡，為節省開支，上海《大公報》攝影記者魏守忠購進「當時國內唯一能連續閃光的燈具」，號稱「萬次燈」，非常引人注目。但機器是「20來斤的大鐵箱，背在身上是個沉重負擔，而且電瓶裡的酸水會腐蝕衣服」，<sup>228</sup> 也不太實用。

燃燒鎂粉或鎂光燈泡都是耗材需節約使用，<sup>229</sup>（圖25）為1946年《新聞天地》插圖〈中國攝影記者的苦悶〉，<sup>230</sup> 描繪中國報界資金缺乏，閃光設備不如外國媒體。故常有蹭光情形，1936年《社會日報》記載，中日記者採訪一場會議，但中國記者沒帶鎂光燈，約同日本記者「攝影時共同通知，俾可同時攝取」。日本記者雖口頭答應，但拍照時卻呼叫後沒放鎂光，讓中國記者浪費底片。過幾天另外的採訪場合，換成日本記者沒帶鎂光燈要蹭光，「我方記者乃乘機報復，相約於第一次口號時，各不動作，至第二次發號始行攝取」。<sup>231</sup>

<sup>225</sup> 趙效沂，《報壇沉浮四十五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頁5。

<sup>226</sup> 曉廣，〈怎樣做攝影記者〉，《新聞雜誌》，第1卷第12期（1936年10月），頁13。

<sup>227</sup> 〈國大攝影記者之苦悶〉，《羅賓漢》，上海，1948年12月20日，版1。

<sup>228</sup> 魏守忠、管紹熙，〈上海大公報的攝影工作〉，收入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頁233-234。

<sup>229</sup> 戈公振在1926年撰的《中國報學史》記載「鎂燈每盞約二百元」，請參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233。

<sup>230</sup> 宣相權，〈中國攝影記者的苦悶〉，《新聞天地》，第12期（1946年4月30日），頁13。

<sup>231</sup> 綠聰，〈中日攝影記者鎂光登報復〉，《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5月9日，版1。





圖25、描繪中國攝影記者閃光燈不如外國記者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宣相權，〈中國攝影記者的苦悶〉，《新聞天地》，第12期（1946年4月），頁13。

#### 四、照片的傳遞

報刊上的照片若非報館資料照片，而是直接在外攝取，會因傳遞時間造成刊登上的延遲，分本埠、郵寄、電傳照片三種方式說明。

第一種是本埠新聞。上海本地的新聞照片，無論來自報館、照相館、通訊社，幾乎都能在次日與新聞同時見報。大報館有自己的攝影記者與的銅鋅部門，即使拍照時間非常晚，也能在次日報上看到。如1927年12月2日〈今晨上海空前之大火〉，《時報》攝影記者張有德前一天才在蔣介石宋美齡婚禮拍攝大量照片，當夜又遇麵粉廠火災，只得趕赴現場拍攝，讓《時報》一早就刊出來，<sup>232</sup>可見報館聘有專職攝影記者後，在本埠新聞上的機動性。

<sup>232</sup> 張有德，〈長豐麵粉廠被燬情形一〉、〈長豐麵粉廠被燬情形二〉、〈火！六小時之大火！〉，《時報》，上海，1927年12月2日，第一張版4、5。



第二種是郵寄的外埠新聞。為方便寄送與確認品質，外地「攝得的照片，都在途中自行沖洗，保證技術上不出差錯，然後寄回上海」。<sup>233</sup> 照片寄送時間與距離遠近有關，如綏遠歸綏費時7天，甘肅蘭州5天，山西太原4天。<sup>234</sup> 福建福州、陝西西安都是3天，浙江杭州只要2天。<sup>235</sup> 首都江蘇「南京下午四時前所得的消息與圖片，照例都託飛快車上的職工帶往上海，晚間十一時報館可以收到」，<sup>236</sup> 照片就能與新聞次日見報。報館常採混合編輯的方式，如1946年《申報》國民黨二中全會新聞，會議地點在四川重慶，3月4日刊登的是3日第二次大會、電報傳來的消息，搭配的是1日開幕式、郵寄送來的照片。<sup>237</sup>

空運傳遞會快一些，《新聞報》顧執中回憶1936年11月日軍侵略綏遠，報社派他去採訪，因綏遠前線無法航空寄信，通訊稿及照片先陸運寄至北平，再請該報駐北平記者空運至上海。顧執中白天到前線採訪，回歸綏馬上將新聞擇要寫成電訊稿，去電信局拍電報，再找照相館沖洗照片。晚上回旅館寫通訊稿，次晨照相館開門後，將照片及通訊稿一起寄出。<sup>238</sup> 為瞭解每種傳遞方式的時間差，筆者檢視《新聞報》，發現11月25日有則「歸綏急電」，報導「我軍24日晨占領百齡廟」，<sup>239</sup> 即顧執中當天擇要、去電信局拍出的電報新聞。11月29日有篇「本報戰地特派記者通訊」，詳述11月24日我軍占領百齡廟的過程，並搭配三張照片（圖26），<sup>240</sup> 即24日顧執中拍的照片，深夜撰寫稿件，25日郵寄出去、經北平28日寄

<sup>233</sup> 馬國亮，《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頁81。

<sup>234</sup> 歸綏、太原、蘭州的新聞照片分別為〈鄂友三少將英姿〉、〈太原鳥瞰〉，《申報》，上海，1948年3月6日，版5；〈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申報》，上海，1949年3月8日，版5。

<sup>235</sup> 福州、西安、杭州的新聞照片分別為〈齊集在福州等待出口之福建最大宗特產——木材〉，《申報》，上海，1948年3月2日，版5；〈一行列的馬車〉、〈報慈寺前之宋梅亭〉，《申報》，上海，1948年3月5日，版5。

<sup>236</sup> 朱子家（金雄白），《黃浦江的濁浪》，頁185-186

<sup>237</sup> 〈蔣總裁致詞攝影〉、〈會場情形〉、〈二中全会昨續開大會，檢討軍事復員問題〉，《申報》，上海，1946年3月4日，版1。

<sup>238</sup> 顧執中，《報海雜憶》，頁69-70、73。

<sup>239</sup> 〈綏遠戰事重心西移，國軍昨攻克百齡廟〉，《新聞報》，上海，1936年11月25日，版4。

<sup>240</sup> 顧執中，〈綏東抗戰最前線，紅格爾圖陣地巡視記〉，《新聞報》，上海，1936年11月29日，版4。

到上海，於29日刊出的通訊新聞。對上海報館而言，遠在綏遠前線的新聞，緊急的透過電報次日可見報，照片因要在當地找店沖洗印出、郵寄，5天後才能刊出。



圖26、記者赴綏遠前線採訪拍照製成的新聞影像圖

資料來源：顧執中，〈綏東抗戰最前線，紅格爾圖陣地巡視記〉，《新聞報》，上海，1936年11月29日，版4。

第三種是電傳照相。電報發明後，科學家致力研究以電報傳送圖片，1903年德國的葛恩發明圖片傳真術，1907年法國的貝蘭成功表演照片傳真，廣東的《農工商報》立刻報導，表示「數千英里外，電傳照相異常清楚，其電傳時刻，約12分鐘」。<sup>241</sup> 貝蘭繼續改革機器，1913年製成第一部用於新聞採訪的手提式傳真機，1914年法國一家報紙首次刊登電傳照相。中國通過留學生接觸這項技術，1926年在北京和天津郵政總局試驗，4月發出京劇大師梅蘭芳的手跡及照片，7月奉天與

<sup>241</sup> 〈電傳照相法〉，《農工商報》，第9期（1907年8月1日），第23頁。

北京、天津間利用電話線路開辦此項業務，不過這些傳真線路使用者太少，經濟難以維持，不久都停辦了。<sup>242</sup>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從德國西門子公司訂購一台無線電傳真收報機，擬在南京柏林間開通。1930年6月26日試驗成功，「歷時4分半鐘」，收到駐德國公使蔣作賓的手稿，登於27日南京《中央日報》上。<sup>243</sup>

1936年8月1日至16日，德國柏林承辦二戰前規模最大的一次奧運會，當時中國報界稱為「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有6家媒體派記者隨中國代表團採訪。<sup>244</sup> 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雖沒派記者，但透過國際社的羅谷蓀取得大量照片。《申報》、《大公報》並以電傳照相作為彌補，《申報》有5張，稱為「無線電攝影」；<sup>245</sup> 《大公報》有10張，稱為「電送照像」（有的特別註明日本同盟社供稿）。<sup>246</sup> 雖然1935年上海《攝影畫報》報導電傳照相在德國的革新，「能於每秒鐘內傳達電顫120萬次，可使普通新聞照片得一清晰之輪廓」；<sup>247</sup> 但檢視1936年《申報》、《大公報》的奧運電傳照相，發現照片通過傳真後會產生紋路，<sup>248</sup> 呈現效果不佳。圖27是《大公報》同天同版的奧運照片，左邊是一般郵寄照片，右邊是電傳照相，<sup>249</sup> 畫質差異一望而知。不過電傳照相可節省時間，希特勒參加奧運開幕式是8月1日，《申報》12日刊登郵寄照片，中間差11天。<sup>250</sup>

<sup>242</sup> 王明亮，〈傳真技術傳入中國考——兼述其在新聞事業中的應用〉，《國際新聞界》，2013年第9期（2013年9月），頁154-161。

<sup>243</sup> 〈國史館致交通部電真跡〉、〈交通部昨試驗，中德無線電傳真電報〉，《中央日報》，南京，1930年6月27日，第一張版3。

<sup>244</sup> 中央通訊社馮有真、《中央日報》儲安平、國際新聞攝影社社長羅谷蓀、《時事新報》特派記者毛以信、香港《中興日報》一位呂姓記者、天津《益世報》一位署名「靜遠」的通信記者。

<sup>245</sup> 如1936年8月9日2張、14、16、17日各1張。

<sup>246</sup> 如1936年8月7日2張、8日3張，13、14、15日各1張。

<sup>247</sup> 〈攝影新光：無線電中傳影電線之發明〉，《攝影畫報》，上海，第11卷第5期（1935年3月），頁109。

<sup>248</sup> 電傳照相是將原像製成原筒形膠片，用弧光燈照射，相片之各元素點被光照過明暗不同，映過的光線亦忽強忽弱，可變成電流傳送。參見佚名，〈電傳照像與新聞事業〉，《報學月刊》，上海，第1卷第4期（1929年6月），頁41。

<sup>249</sup> 〈阿根廷之划船選手〉（左）、〈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開會時，貝萊拉伯爵與西斯談話情形（右）〉，《大公報》，天津，1936年8月7日，版9。

<sup>250</sup> 〈希特勒到會場〉，《申報》，上海，1936年8月12日，版16。

美籍非裔選手歐文思（Jesse Owens）8月3日百米決賽奪冠，《大公報》、《申報》以電傳照相刊登於8日及9日，<sup>251</sup> 中間差5、6天，比郵寄照片省一半時間。



圖27、照片印刷效果比較：（左）照片製版，（右）電傳照相

資料來源：〈阿根廷之划船選手〉（左）、〈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開會時，貝萊拉伯爵與西斯談話情形〉（右），《大公報》，天津，1936年8月7日，版9。

中德以外，中美間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致力於情報交流，重慶國民政府交通部1942年與美國大使館新聞處合作，12月15日中美電傳照相正式開放。<sup>252</sup> 上海《新聞報》戰後與美國聯合通訊社（簡稱美聯社）合作，特約代發電傳照相。如1948年3月6日，魏德邁將軍在華盛頓與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談話，合影日期在4日，2天後即在上海《新聞報》刊出（圖28）。<sup>253</sup> 可知一樣是電傳照相，1940年代的傳送速度與照片畫質，已較1930年代進步。

<sup>251</sup> 〈本月三日百米決賽終點之一幕，最右為第一歐文思（電送照像）〉，《大公報》，天津，1936年8月8日，版9；〈百公尺決賽終點衝過白線者即歐文思（無線電攝影）〉，《申報》，上海，1936年8月9日，版15。

<sup>252</sup> 王明亮，〈傳真技術傳入中國考——兼述其在新聞事業中的應用〉，《國際新聞界》，2013年第9期（2013年9月），頁154-161。

<sup>253</sup> 〈魏德邁將軍在華盛頓與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談話〉，《新聞報》，上海，1948年3月6日，版1。





圖28、1948年電傳照相的印刷效果影像圖

資料來源：〈魏德邁將軍在華盛頓與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談話〉，《新聞報》，上海，1948年3月6日，版1。

## 伍、結論

經本文論證，我們瞭解攝影傳入近代中國的過程裡，新聞界是如何接受與應用這項技術，及上海民營大報在其中的領頭貢獻。報刊的各類新聞照片有其特色：國內新聞要掌握政治人物的行蹤，國際新聞需克服照片傳遞的問題，社會新聞受民眾喜愛數量最多，影劇照片主要是影劇明星的業配宣傳，體育照片追求速度很難拍攝，文藝照片作為調劑篇幅之用，風景照片是外界投稿的大宗。報館蒐集照片的途徑日趨多元，拍照器材與製版技術不斷革新，除戰時照片數量下降外，基本上是個逐步進展的過程。

最後筆者想問：照片多寡與銷量完全相關嗎？透過橫向比報，結果卻不盡然。顧德曼（Bryna Goodman）研究1928年上海著名的社會新聞——馬振華汪世



昌自殺案，討論記者、新聞當事人、讀者間的互動。<sup>254</sup> 筆者以該案報導期間（3月18至22日）為例，比較上海前三大報《新聞報》、《申報》、《時報》的版面數、價格、照片數（表2）：

表2、上海各報關於馬振華自殺案的照片比較表

	平均每日版面數	每日售價	平均1版價格	照片數	馬振華案照片數
《新聞報》	25.6	3分6厘	0.14分	6	0
《申報》	24	4分	0.17分	9	0
《時報》	9.6	3分	0.31分	7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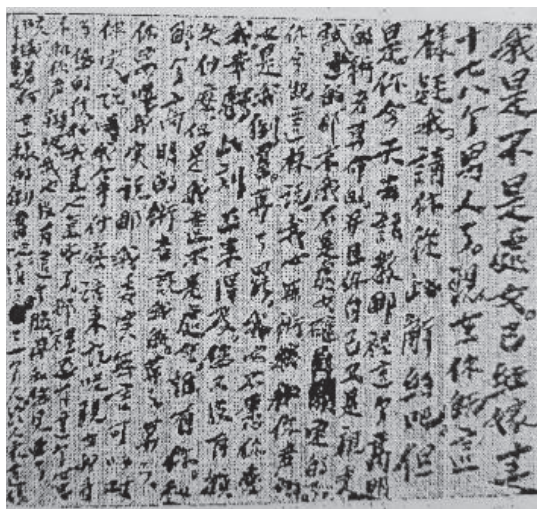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新聞報》、《申報》、《時報》，上海，1928年3月18-22日。

這5天《新聞報》登6張新聞照片，《申報》9張，馬振華案兩報都沒照片，僅以文字報導。<sup>255</sup> 《時報》則有76張新聞照片，平均1天15.2張，馬振華案登7張照片，如在救生局搶拍到的遺體與情書照（圖29、30）。<sup>256</sup> 《新聞報》的照片雖最少，但版面最多，平均1版僅0.14元，對讀者來說很划算，報館的廣告收入也豐厚。《時報》的照片最多，對馬振華案又生動報導，但其他的新聞沒《新聞報》、《申報》多，平均1版要0.31元，價格是《新聞報》的2.2倍、《申報》的1.8倍。

<sup>254</sup> 馬振華與汪世昌訂婚後發生關係，汪疑馬非處女，馬振華帶著兩人的一百多封情書，1928年3月16日投江自殺，被《時報》報導並拍攝遺體與情書，引發社會熱議，19日汪世昌將他對馬振華自殺的回應交給《時事新報》後投江，自殺未遂被救起。參見顧德曼，〈向公眾呼籲：1920年代中國報紙對情感的展示和評判〉，《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4期（2006年12月），頁179-204。

<sup>255</sup> 〈南碼頭發現溺水女屍〉，《新聞報》，上海，1928年3月18日，第四張版3；〈南碼頭查獲溺斃女屍〉，《申報》，上海，1928年3月18日，版15。

<sup>256</sup> 〈馬振華案〉，《時報》，上海，1928年3月19日，版4、6。



29

30

圖29、馬振華遺體的影像圖

圖30、馬振華致汪世昌情書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馬振華遺體〉，《時報》，上海，1928年3月19日，版4；〈馬振華致汪世昌情書〉，《時報》，上海，1928年3月19日，版6。

再比較三報攝影附刊的存在時間，《時報》「圖畫時報」1920年創刊，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度中斷出版，1937年上海抗戰爆發後停刊，存在最久。《申報》「圖畫週刊」1930年創刊，1932年一二八事變停刊，1934年復刊，1937年抗戰爆發後停刊。《新聞報》「圖畫附刊」1930年創刊，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停刊，為時最短。三報中《時報》最重視照片，《申報》次之，《新聞報》最末；但照片量與銷量沒成正比，《新聞報》、《申報》是上海也是全國銷量第一、二名的日報，《時報》卻不賺錢。雖然郎靜山回憶《時報》一張精彩的新聞照片可增加兩三千份銷量，<sup>257</sup>但照片成本高又會排擠版面，不是用越多越好；對讀者來說，日報照片的時效性雖高於雜誌，但紙質與印刷卻限制照片的呈現，要欣賞照片還有畫報可選擇。幾位《時報》記者都印證該報的虧損：黃伯惠「對《時報》確是

<sup>257</sup> 郎靜山口述，呂天行筆記，〈攝影生涯五十年〉，《傳記文學》，第66卷第5期（1995年5月），頁44。

肯花錢與花精力的」，<sup>258</sup> 但對「編輯部與經理部的日常業務，倒很少過問，他關心的是圖片」；「廣告方面」，「一直並無進展」，「遇有新聞過於擁擠，版面無法支配時，向他請示，他會毫不考慮地說：『抽掉廣告』！於是每月的虧折，一開始的幾年，就達五萬之鉅」。<sup>259</sup> 後期《時報》，「經常虧損」。<sup>260</sup>

《時報》1920年首創攝影附刊，雖影響《新聞報》在同年成立製版部，但《新聞報》的銅鋅版機除幫本報照相製版外，還積極開展代客承製銅鋅版、鑄製銅招牌及賽銀器的副業。銅版紙精印、隨報附送的攝影附刊因代價太高，整整10年後的1930年《新聞報》、《申報》才願意嘗試，《申報》胡仲持認為：

號稱上海新聞界巨擘的新申兩家卻至今還未聽得有附刊畫報的意思，他們兩報都設有規模宏大的製版部，卻一意以招攬外間的「銅招牌」以及「賽銀器具」的生意為務。<sup>261</sup>

《時報》攝影附刊沒有撼動到《新聞報》、《申報》，《新聞報》、《申報》會有攝影附刊，是《時報》攝影附刊主編戈公振跳槽《申報》所致，並間接連動到《申報》勁敵《新聞報》。

報紙以廣告收入為主要金源，卻不能無限擴張版面，《新聞報》協理汪仲章分析：「超過五大張〔按：即20版〕，售報收入就要不夠紙張成本」。<sup>262</sup> 故在版面有限的情況下要印多少、多大的新聞照片，才不致擠壓新聞與廣告的篇幅、克服紙質粗糙印出清晰照片、吸引讀者並與同業競爭？是近代中國報館要權衡的問題。

<sup>258</sup> 顧執中，《報人生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79。

<sup>259</sup> 金雄白，《記者生涯五十年》，上集，頁114-115、118。

<sup>260</sup> 袁義勤，〈黃伯惠與時報〉，《新聞大學》，1995年夏季號，頁42。

<sup>261</sup> 胡仲持，〈上海的新聞界〉，收入黃天鵬編，《新聞學論文集選輯》（上海：大光書局，1935年），頁207。

<sup>262</sup> 汪仲章，〈我與新聞報的關係〉，《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1輯（1982年5月），頁134。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申報新聞報檔案》（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

〈上海各報動態各報負責人及編輯採訪名單申報駐外人員通訊錄〉。

〈申報新聞報晨報的一些章則簡約〉。

〈申報館關於員工錄用補缺及個別人員履歷〉。

〈新聞報館幾個時期職工工資單〉。

### 二、史料彙編

《新聞報概況》。上海：新聞報館，1931年。

《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冊》。上海：新聞報館，1923年。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

### 三、日記、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孔昭愷，《舊大公報坐科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包天笑，《釧影樓日記》。1925年，上海圖書館藏。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朱子家（金雄白），《黃浦江的濁浪》。香港：吳興書報社，1964年。

金雄白，《記者生涯五十年》。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77年。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徐鑄成，《報海舊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馬國亮，《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臺北：正中書局，2002年。

陳存仁，《抗戰時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趙效沂，《報壇沉浮四十五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

顧執中，《報人生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顧執中，《報海雜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 四、雜誌、報紙

- 《大公報》，天津，1927、1936年。  
《大世界》，上海，1918年。  
《女神》，上海，1935年。  
《中央日報》，南京，1930年。  
《中國畫報》，上海，1936年。  
《中國攝影學會畫報》，上海，1928-1931年。  
《中華國貨產銷協會每周匯報》，上海，1947年。  
《中華攝影雜誌》，上海，1931-1933年。  
《中聯影訊》，上海，1943年。  
《天津民國日報畫刊》，天津，1946年。  
《古今半月刊》，上海，1943年。  
《正報》，上海，1939年。  
《民立報》，上海，1910-1913年。  
《生力》，上海，1936年。  
《申報》，上海，1872-1949年。  
《申報館內通訊》，上海，1947-1948年。  
《立報》，上海，1947年。  
《良友畫報》，上海，1926、1930、1940年。  
《東方日報》，上海，1945年。  
《社會日報》，上海，1932-1933、1935年。  
《科學知識》，上海，1933年。  
《紅報》，上海，1928年。  
《時代日報》，上海，1935年。  
《時報》，上海，1904-1939年。  
《捲筒紙畫報》，上海，1928年。  
《報學月刊》，上海，1929年。  
《晶報》，上海，1935年。  
《黑白影集》，上海，1936年。  
《新天津畫報》，天津，1934年。  
《新春秋》，上海，1928年。  
《新聞天地》，香港，1946年。



- 《新聞記者》，上海，1937年。  
《新聞報》，上海，1893-1949年。  
《新聞雜誌》，杭州，1936年。  
《萬國公報》，上海，1901年。  
《農工商報》，廣東，1907年。  
《福爾摩斯》，上海，1931年。  
《戰時新聞》，浙江，1940年。  
《羅賓漢》，上海，1948年。  
《藝文印刷月刊》，上海，1939年。  
《關聲》，上海，1936年。  
《攝影畫報》，上海，1934-1937年。  
《攝影學月報》，上海，1927年。

## 五、專書

- 上海攝影家協會、上海大學文學院編，《上海攝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
-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 仝冰雪，《中國照相館史（1859-1956）》。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
- 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年。
- 伍素心編著，《中國攝影史話》。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84年。
- 吳群，《中國攝影發展歷程》。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年。
- 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
- 林澤蒼，《攝影須知》。上海：新科學書店，1955年。
- 泰瑞·貝內特著，徐婷婷譯，《中國攝影史（1842-1860）》。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
- 祝均宙，《圖鑑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畫報源流特點探究》。臺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2年。
- 馬運增、陳申、胡志川、錢章表、彭永祥編著，《中國攝影史（1840-1937）》。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1987年。
- 高郁雅，《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輔大書坊，2015年。
- 陳學聖，《尋回失落的民國攝影》。臺北：富凱藝術有限公司，2015年。
-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楊雄威，《杯酒之間：清末南昌教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楊暉，《照相製版與平版印刷的原理和實用》。臺北：出版者自印，1965年增訂版。

趙君豪，《中國近代之報業》，收入沈雲龍主編，《進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6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

韓從耀等，《中國現代圖像新聞史（1919-1949）》，第3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王明亮，〈傳真技術傳入中國考——兼述其在新聞事業中的應用〉，《國際新聞界》，2013年第9期。

宋三平、張振亭，〈論戈公振與上海時報專刊〉，《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6期（2013年11月）。

汪仲章，〈又競爭又聯合的新、申兩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5輯（1982年8月）。

汪仲章，〈我與新聞報的關係〉，《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1輯（1982年5月）。

汪仲章，〈新聞報發展過程拾零〉，《新聞研究資料》，總第23輯（1984年1月）。

邵翼之，〈我所知道的上海時報〉，《報學》，第8期（1955年12月）。

胡仲持，〈上海的新聞界〉，收入黃天鵬編，《新聞學論文集選輯》。上海：大光書局，1935年。

郎靜山口述，呂天行筆記，〈攝影生涯五十年〉，《傳記文學》，第66卷第5期（1995年5月）。

袁義勤，〈黃伯惠與時報〉，《新聞大學》，1995年夏季號。

張世瑛，〈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1928-1931）〉，《國史館館刊》，第44期（2015年6月）。

陶菊隱，〈我所瞭解的新聞報〉，《新聞研究資料》，總第6輯（1981年）。

陶菊隱，〈新聞報發家史〉，《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60年5月）。

路鵬程，〈從照相館到新聞館：中國近代職業攝影記者的形成與發展〉，《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10期（2020年10月）。

魏守忠、管紹熙，〈上海大公報的攝影工作〉，收入周雨編，《大公報人憶

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顧德曼，〈向公眾呼籲：1920年代中國報紙對情感的展示和評判〉，《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4期（2006年12月）。

## 七、學位論文

劉欣，〈新聞攝影如何變成常規：近代中國新聞界對攝影術的接受與應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碩士論文，2018年。

謝太平，〈新聞攝影在中國：從攝影傳入到人民新聞事業形成的發展歷程探析（1840-1945）〉。蘭州：蘭州大學新聞學碩士論文，2006年。

## 八、網路資料

郎靜山，〈中國攝影史略〉，《中國攝影》，1963年；收錄於「郎靜山藝術文化發展學會」，網址：<http://www.longchinsan.com/?p=2919>（2023年6月12日點閱）。

郎靜山，〈中國攝影史〉，收錄於「郎靜山藝術文化發展學會」，網址：<http://www.longchinsan.com/?cat=84&paged=2>（2023年6月12日點閱）。